

全球对话

14.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赵汀阳 谈社会学

Sari Hanafi

Federico Neiburg
Isabelle Guérin
Susana Narotzky
Eugênia Motta
Clara Hernández
Mariana Luzzi
Cristina Cielo
Cristina Vera
Bibiana Martínez Álvarez
Florent Bédécarrats
Flore Dazet
Mireille Razafindrakoto
François Roubaud
Boris Samuel
Beatrice Ferlaino
Caroline Dufy

生活成本

Breno Bringel
Geoffrey Pleyers
Laurence Cox
Alberto Arribas Lozano
Sutapa Chattopadhyay
Carlos Y. Flores
Lev Grinberg

开放行动

理论观点

Paolo Gerbaudo

议题开讲

- > 菁英政治的威权主义
- > 鉴识技术的殖民主义
- > 联合国机构内(外)的多样性与透明度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4卷 / 第1期 / 2024.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欢迎阅读2024年的第一期《全球对话》! 去年对新的编辑团队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充满起伏跌宕的试验期。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让大家知道今年的刊物中,将会有哪些新的安排。我们将在每期刊物中介绍新的计划、新的合作关系,以及全新的沟通与传播策略。同时,本刊物也将继续维系一直以来的使命与初衷——公共/全球社会学。

本期刊物的专访,由ISA前会长Sari Hanafi与赵汀阳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其中,这位杰出的中国知识份子,反思了他的一些主要理论作品,并分享其目前对自由民主危机的解读。

接下来的专题,则是由Federico Neiburg、Isabelle Guérin和Susana Narotzky所组织,以「生活成本」为主题,讨论如今正引人热议的问题: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对多数人而言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作者们认为,我们不应将生活成本仅仅视为一个数字或指标,而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多重意涵的实际范畴。这八篇文章分别针对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的相关现象,进行了概念与实证讨论,例如不同的参与者(家庭、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如何面对危机。本专题是《全球对话》与《国际社会学》共同合作的成果。这次的合作将成为一次先例,在往后的刊物中,我们也会继续有这样的合作形式。我们希望能将刚出版的《国际社会学》特刊当中的重要成果,带给更多读者。

第二个专题,则与另一个新的合作关系有关。「openMovements」是由独立媒体平台Open Democracy于2015年发布的计画。如今,其也成为了《全球对话》的新版图之一。我们将尝试借此计画,理解那些由社会冲突/运动促成的重大社会变迁;我们不只关注出现于报纸头条的、显眼的重大事件,也会试图探究那些隐微、却又与文化及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变迁。「openMovements」的宗旨,是促进ISA内外针对全球社会变迁公共社会学的开放讨论。该计画的创始人、ISA现任主席Geoffrey Pleyers,将和我一起在一篇文章中解释openMovements的

观点、近年来的事务,以及今后的打算。另外几篇文章,分别讨论参与式研究的重要性、南方于全球对话中的定位、新入行研究者急需的支持(Cox、Arribas Lozano和Chattopadhyay)、视听项目如何于社群中作用,以及其如何影响知识的叙事和去中心化(Flores)。最后一篇文章,则以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为主题,尝试在讨论这场冲突的同时,保有对其脉络的关注,以避免简化这个议题(Grinberg)。

本期的理论专题,探讨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转型过程。着名公知Paolo Gerbaudo以一个复杂且创新的观点,分析了干预主义国家「奇怪回归」的过程中,有哪些矛盾与趋势。最后,议题开讲中收录了三篇文章,分别讨论菁英统治的独裁面向(Maciél)、多边组织的低多样性与扭转局势的挑战(Gonzalez),以及一种尚未被分析的殖民主义类型——Mark Munsterhjelm将之定义为「鑑识殖民主义」(forensic colonialism),这种殖民主义是由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家所促成,他们将原住民作为资源,以及血统、推论和表型等新技术的使用对象。

我诚挚地希望你们喜欢本期刊物,同时也想提醒各位,我们是开放接受稿件的。请关注我们的社群媒体@isagdmag、以你的语言协助推广《全球对话》。■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官網](#)。

> 投稿來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編: 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編: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Shaikh Mohammad Kais,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Md. Shahidul Islam,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Eashrat Jahan Eyemooo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Urszula Jareck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George Bonea, Marina Defeta, Costin-Lucian Gheorghe, Alin Ionescu, Diana Moga, Ramona-Cătălina Năstase, Bianca Pințoiu-Mihăilă.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黃翊碩, 簡芋樞,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郭智豪.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赵汀阳与 Sari Hanafi 讨论了他所谓的「天下体系」, 一种另类的政治概念。



不只是专家, 人们也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生活成本」这个具有多重意涵的实用范畴, 其涉及了世界各地的多种现实。



新的专题「开放行动」将以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及其挑战为主题, 并为这些内容提供空间。

封面相片: Wirestock, Freepik。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录

主编的话 2

> 社会学对话

天下体系与智能民主：专访赵汀阳
Sari Hanafi, 黎巴嫩 5

> 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专家概念与日常努力
Federico Neiburg, 西班牙、Isabelle Guérin, 法国、Susana Narotzky, 西班牙 10

失准：家用钱和通货膨胀经验
Eugênia Motta、Federico Neiburg, 巴西 12

面对当代阿根廷的通货膨胀
María Clara Hernández、Mariana Luzzi, 阿根廷 14

树薯如何维持厄瓜多尔人的生活安定？
Cristina Cielo、Cristina Vera, 厄瓜多尔 16

粮食供给问题的道德困境
Susana Narotzky、Bibiana Martínez Álvarez, 西班牙 18

追踪马达加斯加的生活成本
Florent Bédécarrats、Flore Dazet、Isabelle Guérin、Mireille Razafindrakoto、François Roubaud, 法国 20

价格补贴在摩洛哥的影响力
Boris Samuel, 法国、Beatrice Ferlaino, 义大利 22

战争时期的粮食安全——以俄罗斯为例
Caroline Dufy, 法国 24

> 开放行动

开放行动：公共与全球社会学平台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26

如何研究并理解民众抗争？
Laurence Cox, 爱尔兰、Alberto Arribas Lozano, 西班牙、Sutapa Chattopadhyay, 加拿大 29

玛雅影视实践与知识的去中心化
Carlos Y. Flores, 墨西哥 31

冲突持续扩大——残忍的以巴战争
Lev Grinberg, 以色列 33

> 理论观点

干预主义国家的奇异回归
Paolo Gerbaudo, 西班牙 36

> 议题开讲

菁英政治的威权主义
Fabrício Maciel, 巴西 39

鑑识技术的殖民主义
Mark Munsterhjelm, 加拿大 41

联合国机构内(外)的多样性与透明度
Vitória Gonzalez, 巴西 43

「替代方案还是有的，只是在缺乏公众抗议的情况下，其经常受到忽视。」

Breno Bringel 和 Geoffrey Pleyers

> 天下体系与智能民主： 专访赵汀阳



来源：赵汀阳个人档案。

赵汀阳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知识份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院士／特聘教授，曾在浙江师范大学、伯格鲁恩研究所、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等中外机构任职。他曾以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大量著作，包括《All under 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2021, 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与他人合编的《Transcultural Dictionary of Misunderstandings: European and Chinese Horizons》(2022, Cent mille milliards出版)等书。2023年8月，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国际社会学协会前会长Sari Hanafi 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谈。

Sari Hanafi (SH): 赵教授，我有幸阅读了您的《All under 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这本着作。在书里，您谈到当前世界范围内政治冲突的激增、批判了如今国族—国家主义的国际关系逻辑，并提出「天下」的概念。「天下」是一个中文单词，指的是「普天之下」，其中所有事物相互依存，且世界是高于民族国家的。您能用几句话来简单解释这个概念吗？

赵汀阳(赵): 这样说吧，在我的想像中，借由「兼容」(compatibility)——更通俗一点说，「和谐」(harmony)——的概念，天下体系设想的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认为兼容是更好的翻译，就如同莱布尼茨谈到上帝创造了「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世界」时，使用了「compossibi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其作为最丰富的生命集合。有趣的是，他的本体论和《易经》

非常相近，《易经》也强调万物「兼容」。我认为，天下体系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无外」、所有人之间「大同」、「兼容」的世界。为何中国以「天下」这样的体系作为其政治之始，而希腊却以「城邦国家」为起点？这个问题仍有待解答。

天下不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其提出了另一种政治概念，试图将敌意转为善意的方法或艺术；这与 Carl Schmitt 对敌我的划分、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Morgenthau 的权力斗争、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等等，是截然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政治不能阻止，或至少减少敌意，那根本就不是政治，只是战争罢了。正如 Carl Von Clausewitz 所述，战争指向的是政治的失败，而非政治的延续。如果要打架，何须政治？

>>

我提出的这套天下概念，比起传统的天下更加合理且实用，其中包含三个创新的原则：(1) 内在化 (internalization) 世界：天下是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共同的普遍体系，这将使世界不再有所谓的「外部」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2) 关系性理性：最小化敌意优先于最大化排他性利益；(3) 儒家意义下的改善：柏拉图改善 (improvement) 概念的优化版——一种不具排他性的改善，唯有所有人都改善，个人才真正地达成改善，亦即，当某个个人达成了改善，那么所有人也将达成改善。我希望这套新的天下概念，能解决如技术风险、全球金融、气候变迁、疫情和文明冲突等全球问题。

相应于天下体系，全球伦理也应该建立于比基督教或儒家思想更连贯的「黄金法则」之上。传统的黄金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套法则近乎完美，却过于主观，因为「己」将能够单方面地决定「好的」的普遍概念。因此，我想将黄金法则重写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一来，主体性将转为跨主体性，这套法则的对等性也更加严谨，普遍也于是真正地普遍。

这套新的天下体系，也应该于认识论层面实现。借鑑于18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计画，我将提出新的百科全书概念——这指的不是一本实体书，而涉及了我们如何理解「知识」这项概念。新的百科全书，将涵纳、平等地尊重且肯认所有文明的全部知识；所有人类将面临的问题、研究普遍关注的议题，以及互动的「出现」，都将成为百科全书中的知识发展基础。其中，知识观将是整体论或复杂的，而非传统学科化、还原主义的分类方式；借此，我们将能避免西方知识的片面性，让百科全书成为所有人类的「元宇宙图书馆」。由于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借由网路与人工智能实现这件事情。

SH：您会如何用天下的这套典范，来评价今天的中国？在一次采访中，您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击败、并排除了西方的竞争，却也贬低了中国文化。中国的存在比其身份更佳重要，亦即，存在的事实比事物的外观更为重要。您能用具体的例子详细说明这个观点吗？

赵：天下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概念，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有被实现的潜力。有人以这套概念，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世界模式国家」——然而，中国比世界小了许多，这套概念的潜能，因此也很难呈现；所以，我不确定中国是否可以被视为天下。不过，这还是可以当作一格案例。「世界模式的中国」于汉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220年）开创了「一国多制」，以兼容优先为原则，成功地减少了各种文化或宗教间的冲突，这点非常重要。这也是现代中国活生生的遗绪之一。

现代中国确实贬低了中国的传统面向，这并不稀奇——当代中国一直渴望变得现代化。人们认为，当一个国家面临来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压力，为了生存，现代化即是一种手段。中国人的思维，始终遵循「万变而生存」或「变而生」的原则。这并非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伦理价值；不过，中国人仍然有一套存在的「本体论方法论」。当然，中国有其需要维护的文化或传统身份需要维护，但这些身份的影响力，小于其在生存关键时刻的单纯存在，也小于其变得更好的开端。中国是在「做」，而不仅是「存在」，中国的方法论远比概念重要。中国喜欢随机应变，因为它很早就将《易经》视为其方法论的「圣经」。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方法论，其尽可能地追寻着生存、存在、存续与变得强大的最佳机会。作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之一，儒学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根植于中国社会；其基于机缘巧合，于历史中经历了各种起伏——我不敢说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儒家社会。但我确信，中国人「以变应变」的方法论，依然深植于人们心中，且比起任何特定的价值观、学说或「主义」都有更深厚的基础。

举例来说，这个观点可以解释令人困惑的中国宗教现象。以一神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信仰所有事物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泛灵论或是多神教。具体而言，在民间社会和大多数地区（除了穆斯林地区），人们不会排斥别人的神。相反地，多数人宁愿接受其他神明的故事，也不愿意接受信众自身的故事，更别谈相信他们，或至少尊重他们。因此，很多人会有一长串的神灵名单，其经常来自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许多当地的神。对那些不认真对待宗教的知识份子来说，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主义」，例如左或右派、进步或保守。我很难从他们的选择里面，观察到多少信念或忠诚，多数这类人最终只会转而选择效果更好的选项。

SH：您透彻地分析了自由民主的危机，以及控制资本和媒体的强大势力如何颠覆民主，并指出这种「特洛伊木马」式的、摧毁民主的方式，是来自民主自身的。您能详细谈谈吗？

赵：民主的其中一个弱点，在于其概念的模糊性：由于许多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会有各种解释。这种模糊的表象，使得任何事物都能够被伪装成民主的一部分，并以此为自己辩护；于是，许多民主的「特洛伊木马」就出现了。很惨的是，由于这些概念于外观、实践上的相似，我们很难将之与真正的民主区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因为即便我们知道民主有其特定的起源与基因，我们仍然从未见过理想的民主，或是这样的

>>



来源：赵汀阳个人档案。

民主的本质。最糟糕的事情，是当人们最终发现，伪民主其实是民主的孪生兄弟、两者其实具有相同的基因。民主诞生于集会，然而集会同时也有市场的性质——意见市场接近于商品市场，如果更多的人选择苹果，那么显然苹果是更受欢迎的。

同样地，如果更多的选民支持川普，那么川普似乎就具有正当性了。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这点，因为有力的民主推理事实上是缺乏的，而这就很矛盾了。市场和民主有着相同的基本规则。遗憾的是，多数原则并不总是真善美；更遗憾的是，政治、金融和媒体等势力，有很多方式和机会，去误导和操纵人们的选择。权力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什么策略是最好的。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在市场规则下，越来越多势力以重塑公众认知为策略，借由兜售幻想，创造共同目标。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公共意见制」(publicracy)，或者说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公共意见制，又或是在公共意见制之上，叠加、扭曲的民主制。这就是破坏民主的「特洛伊木马」。

民主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公共意见主义的侵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民主无法识别公共意见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民主和公共意见主义长得太像了。问题在于，现有的民主不够智能，而公共意见制背后的力量，却要智能得多。民主是做出公共选择的一种实用方式，它没有自己的思想，因此无法抵御外部势力。

简言之，民主并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也不能证明什么是正确的；它甚至从未证明过自己是正确的。民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换句话说，民主是决定权利与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但不能定义善、真理或正义。因此，民主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SH: 你设想过任何替代方案吗？

赵: 我期望有一种「智能民主」，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民主，我希望它能变得和试图控制它的那些势力具有同等程度的智能一样，至少得比那些被误导的公众舆论的集合要更加聪明。

让我来解释一下。智能民主包括「两票制」和「两级选举」。两票制是「一人两票」，即任何选举对象，都需要投下赞成票和反对票，这代表一个人的喜欢和不喜欢。「不喜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甚至比「喜欢」更重要，一个人的这两票，将能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的想法，这比起现在流行的「一人一票」更好。两票制的基本规则如下：(1) 净赞成票规则：净赞成票=赞成票-反对票。假设 A 得到 51% 的赞成票和 31% 的反对票，那么 $51\%-31\%=20\%$ 的净赞成票；B 得到 41% 的赞成票和 11% 的反对票，那么 $41\%-11\%=30\%$ 的净赞成票。此情况下，应认为 B 获胜；(2) 有条件多数规则：如果 A 和 B 的净赞成票数相同，则赞成票数多的一方获胜。

两级选举则是指完成投票的两个步骤。首先，每个人投出自己的票。接着，由科学委员会通过知识加权投票，来批准或否决人们的选择。借此，两级选举将两权分离：人们决定什么是可取的，科学委员会决定什么是可行的。如果这样设计，民主就可以在制度上实现智能化，民主本身便具有了智能，并且，民主本身也不再会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总之，这将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民主。目前，我只做到改进投票系统这一步而已。智能民主当然需要更多的智能，以及更聪明的观念。这是一项有待进一步推进的任务。

SH：您呼吁的是一套「以知识为基础的民主」，但是，谁来提名参加委员会的专家？在您的描述里，「专家」似乎只是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但现实中他们往往因政治立场而分裂。

赵：提名始终是个问题，这恐怕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基于党派的政治必然是党派政治。实际可行的办法可能不是最好的，但理想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应该把想象力限制在可以接受的改进上，而不是对民主进行彻底的改革。不过，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名科学委员会的专家，借此管理智能民主呢？我的想法是，以传统的「名声」作为标准，即找出公认的候选人。一个人的名声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例如，那些获得过重要奖项的顶尖科学家，理应更了解人们想要做的事情的潜力或风险。当然，名声可能是错误的，但有知识肯定比无知好。专家们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他们能够诚实。至于私底下的财务关系，这是我们可以排除的问题。

如你所见，我的智能民主理论，是一个混合了各种「政治基因」的组合模型：约 50%来自现代民主，30%来自季子的公共事务最优决策，20%来自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在这个理论中，我试图于由智者处理公共事务与普通事务的传统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理论关注的仍是什么更为合理，至于什么才是最理想的，那还有一段距离。

SH：阅读您的作品时，您对民主制度的强烈批判，似乎无法解释为社会运动的存在。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制度；即使有「特洛伊木马」，它也能够产生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面向的替代方案。

赵：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民主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制度性民主的替代品——社会运动，虽然背后可能有某些组织的支持，但还是可以被视为自发性的民主。我认为它们不是「特洛伊木马」，我也尊重它们。我猜你会说，社会运动是民主更好的一面。可以肯定的是，社会运动更接近直接民主。这是好事。不

过，我认为一个实际问题是，对社会运动的追求，也可能是被不合理的激情所误导，因此，当诉求超过一个国家或世界所能负荷，这有时会是带来破坏、而非具建设性的行动。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家庭主妇懂得持家之道」。与此不同的是，我坚持民主要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制度安排，让自身变得更具智能。「冷民主」(cool democracy)会比热民主更谨慎、更可靠。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们希望社会发生变化，我们如何知道哪些变化对社会更有利？

多数情况下，民主可能对什么是好的视而不见。有趣的是，或者说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的哲学家们仍然对什么是「好」没有明确的概念。今天，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观。这点，仍旧是一个需要被重视的问题。

SH：您质疑民主是否能够作为一种价值观；但构成价值观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限定词(qualifier)。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自由民主的原因。自由主义与民主连结，意味着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协会与政党的建立，以及抽象地(而非具体地)认同《世界人权宣言》。这些价值观，是我们应该批评的吗？我在叙利亚长大，那里的复兴党用「民众」(popular)来限定民主。在叙利亚的「民众」民主中，除非你服膺于统治菁英的意识形态，否则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建立协会和政党的可能性的。此外，议会的投票制度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特别为劳工阶级、农民保留席位这点，即便这两群人不能自由地相互组织，这对我来说仍然是好事。我想说的是，「民众」一词背后，充斥着反自由主义的价值，同时却又追求某种社会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民主时，绝对不能没有限定词。您用了「智能」这个限定词，让民主从目前「以意见为基础」的形式，走向「以知识为基础」。必须要向您请教的是，「智能」相较于过去的两种传统(即民众传统/自由传统)，是如何定位自身的？

赵：谢谢你切中要害的犀利提问。在讨论如何实现「智能」民主之前，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不存在纯粹的民主，因此「真正的」民主，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你说得对：当与限定词连结，民主就会与某些价值相关。这表示，民主这个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工具或程序，我们不会完全地接受某些与自身价值观冲突的民主。限定词比民主更为重要，因为限定词指向了更深刻的问题和冲突。高谈阔论的民主，可能会让我们看不清特定势力对特定价值、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你提出的「限定词」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性，它让我想起了价值排序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排序，这样才不会陷入什么都想做的困境。有价值排序，就有歧视，因此冲突无所不在。歧视是一个可怕的词，

>>

其指的是每个人都歧视着某些对象，即便多数人会以反歧视为立场。不管是以民主、自由、民众、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等标籤进行限定，冲突或分歧都不可能减少，甚至有加剧的可能。因此，我倾向不那么仰赖人们所宣称的价值，无论这些价值多吸引人；并转向开发民主操作系统中的「智能设置」——我希冀借由这种嵌入智能的民主，也就是我称为「智能民主」的这套系统，让知识掌握最终决策的权力。长远来看，超级人工智能，未来可能能够作为人类思维的附加物，协助人类，甚至与人一起工作。最终，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跨主体性于是成形。我希望这种跨主体性，能更智能、更少意识形态。民主的目的，是为整个社会做出公共选择，而不是为相互竞争的政治权力服务。

SH: 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的读者可能很感兴趣的一题。最近，您与欧洲学者合编了《Euro-Chines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一书。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因为您跳脱了后殖民典范，必须审视不同(南方)认识论的同时，还需与欧洲同侪一起克服误解。这和中法研究小组提倡的后西方社会学，以及对学术合作的呼吁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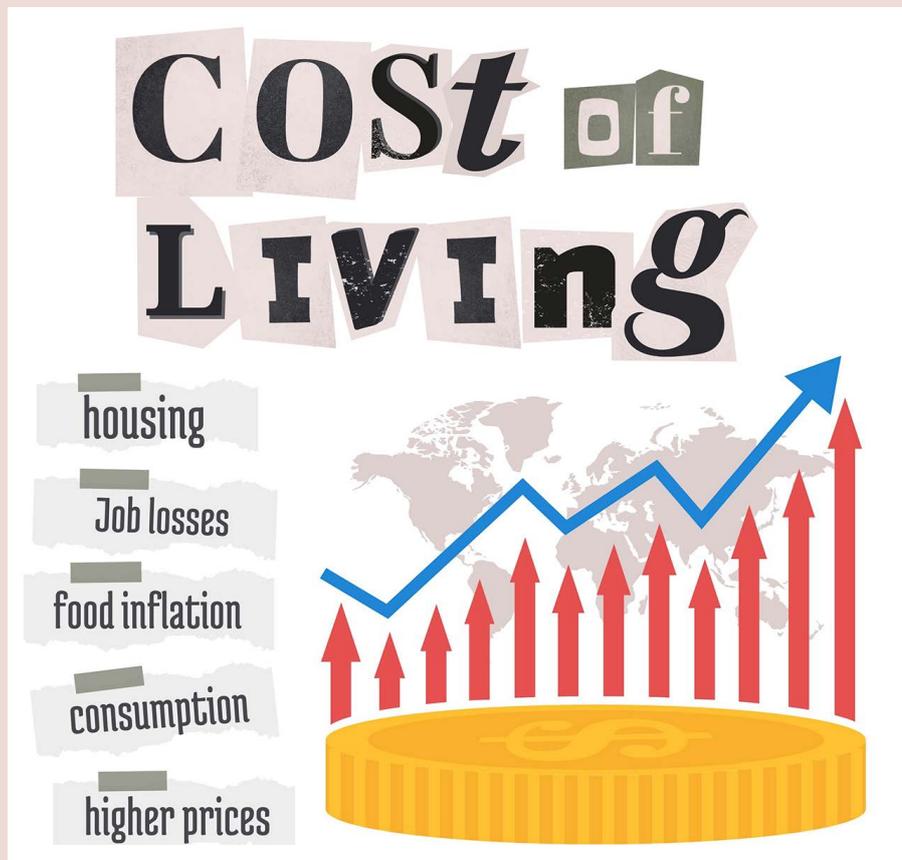
赵: 我们不该继续沉溺于传统认识论的对立与竞争，而需要发展一种新的、更好的认识论。我不认为后殖民主义观点，就是摆脱殖民主义——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东方主义的出路。当我们尝试用后殖民主义的方式来反驳或「反述」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东方主义图像时，我们的思想会受到殖民主义的概念与模式限制、束缚与误导。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试图反驳殖民主义，我的思考架构，将会是由殖民主义概念所构建的——其将以殖民主义的论述为基础，难以说出我自身的想法。如果你说「我不是你想像的那样」，你的视野和视线，就会不由自主地被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的视野禁锢、失去心灵自由。认识论的对立，终归是沉闷而消极的。与之不同，我想要做的，是从全人类面临的、具普遍性的关键问题切入，我们可以分享／交流不同的概念、论据，或讨论彼此之间的误解；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可能从中受益。在找到更好的词汇之前，我暂时将这样的观点称为「跨文化的增值」(transcultural multiplication)。

对任何人来说，误解别人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别人也总是有误解我们的理由。借由澄清基本概念，我们可以减少彼此的误解，并检查双方理论与概念背后的预设，是否真是一致的。■

> 生活成本： 专家概念与日常努力

Federico Neiburg,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Isabelle Guérin,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法国, 与 Susana Narotzky,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西班牙

来源: Vitoria Gonzalez, 2024°



此专题为全球对话与国际社会学之合作结果。借由这个专题，我们的目标是向更广泛的读者介绍《国际社会学》刚出版的一期特刊的一些主要成果。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生活成本的概念，这是一个参考了危机时期的无数努力与经验，在专家领域中被创造与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贯穿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民概念。我们提出了一个多尺度、历史与比较的视角，能够观察与分析由多重危机在当代导致的困境。这些因素包含食品与能源等基本项目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不稳定，以及2019新

冠病毒大流行后全球范围内薪资迅速下降等综合影响。危机的多重层面影响了个人与家庭寻求有价值生活的方式。我们也关注生活成本上升的道德与政治层面，以及在专家世界、公共空间与个人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冲突与挣扎。

> 背景

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气候危机与东欧的战争，这些影响使得生活成本提高、通货膨胀与饥饿成为公共辩论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核心问

>>

题。许多人必须面对货币购买力下降以及食物、水和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链断裂所造成的短缺。史无前例的物价上涨周期扩展到全球各地。这不仅影响到全球南方国家中最贫穷的阶级与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影响到欧洲与北美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在2022年三月突破六十年来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系列也显示，粮食与能源价格出现了一百年来的最大涨幅。基本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当前多重危机的一个关键面向，其他面向包含就业机会的缺乏或其不稳定的性质、工资实际价值减少、大规模移民与环境紧急情况。

> 概念

「生活成本」是一种一词多义的实际范畴，是我们试图捕捉的多种解释。「生活成本」的概念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为一种以数字和精钱来衡量人类生活的工具，与现代经济学一同诞生。产出生命是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价格的（例如，一篮商品的货币价值），这个价格的差异会以相对于时间段的百分比表示：每周、每月、每年。因此，在专家的世界中，生活成本本质上与两个主要面向有关：首先，将通货膨胀是为社会事实与政府目的来理解；其次，对必需品或基本需求的概念。通货膨胀与生活成本数字的产生，是政府、企业、工会、国际组织与人道组织机构皆参与其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也形成了国家和国际公共辩论，以及政治斗争的局面。

然而与此同时，生活成本的概念也存在于经济专家和那些涉及经济生活的管理者的领域之外。生活成本是一个超越数字指数的实际范畴：他涉及个人、家户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之流。它指的是无数的成本与努力，这些成本与努力为行动、策略、日常快乐与挫折，以及社会运动和隐藏的违法行为（例如那些发起反对通货膨胀或昂贵生活的主张）赋予意义。

> 填补縫隙

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的领域已经将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饥荒与饥饿概念化。然而，除了少数的案例以外，这些现象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似乎仍然处于边缘而尚未进入到议程中。本专题和《国际社会学》特刊的目的正是想填补这部分的空白。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多学科与多尺度的方法。本卷中的文章通过各种主题和学科传统来介绍：政治社会学与市场、价格与数字经济学；经济与女性主义社会学以及日常实践及其情感、亲密与感受层面的人类学；以及食物与生命的政治生态学。与此同时，这里所收集的文章显示出国际地缘政治间的纠缠，人道救援组织与援助在界定当地背景下的生活成本指标的巨大影响力，国家政府模式及其殖民历史，以及人民和家庭日常生活中，生活成本的亲密性与感受。

公共辩论、专家知识与普通公民的观念与实践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但它们也在相互融合、建构。的确，社会学和人类学可以揭示这种共同建构及其间隐含的紧张、冲突与循环。比较和历史的视角也揭示了生活成本是如何不均匀的分布，这些不平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转变，政策制定者、专家和家庭如何应对危机，同时动员或忽视在其他危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倾向。

我们从双重意义上的比较观点关注这些过程：借由关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过去与现在的情况；也借由将国家与国际范围内的宏观过程，与日常生活的围观层面相互联系，在通货膨胀、饥荒与饥饿中寻找有价值的生活形式。这些层面与过程的纠缠重新唤起权力关系的问题，关于什么是合法的、可被接受的、正常的或基本的、以及什么不是的道德辩论，并且根据谁的观点，关于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的争论，上述的问题因国家背景与历史、性别关系、种族与阶级差异而有很大的变动。■

來信寄至：

Federico Neiburg

<federico.neiburg@gmail.com>

> 失准：家用钱和通货膨胀经验

Eugênia Motta 和 Federico Neiburg,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Maré Complex, 2020
来源: Brasil de Fato

本文中，我们将讨论里约热内卢的马雷贫民窟，在新冠肺炎的持续影响下，于2021到2022年所历经的物价上涨，尤其在食物及能源的项目上。我们以校正 (alignment)，和从其延伸的失准 (misalignment)、重新校正 (realignment) 的概念，从人民和家庭对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到近期需要立即下判断的琐事，分析透过适应不同规模的物质变化和对未来的展望，来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方法。我们将人们和各个家庭面对收入不稳定、资金流动变化、调适因通膨造成的挫败感和维持受到危机影响的重要关系的日常行为称作校正行为。举例来说，这些行为包含不断地评估价格变化、在城市中以新的方式移居、将支出(重新)分类和改变商品买卖的方式。因此，校正行为是想像、计算、预测和共同生活的集合，体现在买卖什麼、如何买卖、在哪里买卖和为什麼买卖等一系列的评估中。

> 不寻常的事件与平常的生活

人们面对新冠疫情、经济萎缩和日常用品物价上涨的经验大相径庭，因此展示了各种平凡生活中面对不平凡事物的方式。对于部分与我们谈话的人而言，这段时间的经历，与他们过去长期面对的不确定性、贫穷和挣扎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能够善用过去累积的策略面对这次的冲击。而对某些人来说，通货膨胀和失去收入的打击，加上疾病和亲人死亡等事件，都会增加心中的疏离感。但同时也有些人，透过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和机会。考虑到在马雷贫民窟的居民，前三样主要花费分别是食物、债务和居住，而通膨和食物价格的上涨又是现下的社会不平等主因，因此上述的这些差异正是造成不平等的核心。

从个体的移动能力(受到为了防止新冠肺炎散播的政策所限制)和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两个方面来看,我们所访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都是被具有破坏性和反复性的时间形塑而成。然而,即使在危机日常化的脉络下,价格飙升(尤其在食物和煮饭用燃气)仍旧会对再生产主要空间——家庭,造成重大冲击。这也是为什么通货膨胀时期会需要生活上大幅度且明确的重新安排(在国内经济现况、常规和期待之间的重整),像是改变饮食习惯、审视「生活必需品」的轻重缓急、转化创造收入的方式、贷款或使用政府提供的紧急救助。

房屋是与我们对话的人们主要从事再生产的地点,而厨房则是照护这个家与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核心。因此,食物的购买、准备、食用,有时也包含销售的常规行为改变,大幅度受到食品和燃气价格抬升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家同时是物质、情感和象征性的空间,其中以具有由性别和代际关系所构成的近亲连结特征的团结和张力所贯穿。

> 家用钱

与一般的统计研究,特别是食品安全调查中所呈现的「家庭」项目的样貌相反,家户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们是家庭网络和配置的一部分。房屋之间的远近(或是彼此之间相对的孤立程度)是建构社会距离的关键因素。此外,房屋不仅是消费场所,亦是透过提供维修服务或个人照护和製作出售食品来获得收入的场域。屋子本身、其中的窗户和房门,都可以被视作一个市场。销售行为可能是不定期的、也可能是例行发生的,有时家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提供协助。

描绘出通货膨胀时期,特别是在食物和煮饭用燃气的价格上升的背景之下的关键是「[家用钱](#)」的概念:这是一个巴西当地的说法,让我们可以透过家庭内部的视角研究金钱和货币的不同意义。「家用钱」的概念是指出人、金钱、房屋之间道德和实际的联系,强调为了维持「家」作为一生活空间,所产生的共同及常见需求,并从中延伸出租金、服务和食物等具强制性和规律性的花费。因此,人们可能透过重新定义什么是所谓(再)生产生活中的必要支出,将生活策略着重在校正日常所面对的各式阻碍(尤其是减少能源花费)。

> 关于通货膨胀的民族誌评论

校正的概念佔据了通货膨胀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所谓的货币主义观点解释了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过剩和预期与物价上升不匹配的结果。非主流的观点透过识别出生产链的适应不良和由分配纠纷导致的不公来解释通货膨胀。基于我们在马雷贫民窟所访问到的对象,他们在生活花费上的特定和日常经验,以及采纳考虑[通膨的感官面向](#)的看待货币的实务角度,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通货膨胀本身概念的民族誌评论。■

來信寄至:

Federico Neiburg

<federico.neiburg@gmail.com>

Eugênia Motta

<motta.eugenia@gmail.com>

> 面对当代阿根廷通货膨胀

María Clara Hernández,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阿根廷, 和 Mariana Luzzi,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Martín, 阿根廷



来源:Vitória Gonzalez, 2024。

在过了这么多年后,近几年通货膨胀又再次回到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议程中的核心问题,物价上涨的源头和其解决之道已成为政府内外各专家的讨论重点。而人们如何应付在通膨下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又可以从其中告诉我们些什么?当谈论到生活开销成本的提升如何影响家庭经济时,有许多问题陆续被提出:个体如何展现出其与通膨之间的特定关系,如何将物价上涨的事实纳入日常实作?价格的起伏如何随着时间影响人们对物品交易的预测?在持续的通膨下,哪些会计方法被实践了?

本文将透过阿根廷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来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分析物价上涨如何成为人们的担忧;另一方面,展示家庭经济领域中,衡量通货膨胀的常见方法。透过经济社会学,我们强调两个与生活开销成本提高相关的核心问题:第一,家户如何经历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第二,经济现象相关的非专业知识与专业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

>>

> 通货膨胀与阿根廷的日常经济生活

阿根廷是一长期受通膨之苦的国家，也是少数在新冠肺炎前便已是高年通膨率的国家之一。在2003年到2006年间，阿根廷的平均通膨率小于10%。而到了2007年到2021年间，通膨率跃升至30%，并在2022年达到每年上升94.8%的幅度。使通货膨胀在过去15年间成了国内的公众问题。

2017年到2020年间，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的中型城市，针对中、低收入户进行调查。我们的目标是研究长期通膨下的家庭经济实作中，消费、预算、存款和信贷行为的配置。并且额外以一项观察新冠肺炎疫情间的各式家庭经济调查来进一步充实我们的研究结果，虽然通膨的影响并不是这份调查的主要目标，但它的确在研究结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我们所采纳的这份研究中，他们的田野调查凸显了物价上涨对我们所访问的家户的重大影响。

参考通货膨胀和其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我们设计了一份特殊的提案来建构有关通货膨胀的观点，并且不仅是观测重大危机时期的情势。反之，有鉴于物价的普遍上涨已不是特例，而是日常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方法可以同时解释在这些时期变化和不变的事物。这样的方法可以避免将视角限缩在现象的总体经济层面，而是同时纳入对个体日常经济实作影响的考量。

> 主要发现

我们的研究显示了专业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实作与观点之间的连结并不直观，两者的关系比我们大多数时所想的都还要复杂。即使在物价上涨最严重的时期，人们有关家庭经济的讨论也鲜少以学术说词或严谨的测量发法来评论通货膨胀。反而平常最常讨论的是家庭必需品价格的上

涨，或是那些过去用来预测物价的产品（例如石油或货币）的上涨。这两个参照物都是用来表示物价的一般行为和金钱购买力下降的形式。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侧重在让家庭可以掌握通膨趋势的特定预估形式（所谓的通膨的居家测量），展示有关价格的相关资讯如何影响过去作为日常消费规划和家庭支出分配的标准。

最后，我们的研究也显示，与过去学术文献所阐述的相反，家户在面对通膨时首要采取的策略是透过适应当前节奏、地点和购入之物的变化来确保必较的消费。所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利用通膨优势去进行投机行为或寻找获利机会并不是我们的观察对象在面对物价上涨时首要采取的行动。然而，随着通货膨胀在阿根廷逐渐成为持久、恶化的情势，进而影响了实际薪资的变化，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也可能在这过程中有所改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露过去在高通膨时期所发现的个体实作行为是否，并且在什么前提下，会再度出现。

当现在通货膨胀又再次浮现在全球挑战的台面上，阿根廷的案例可以协助阐明与通膨有关的具体微观社会动态是如何以经验基础展开的。遵从此一思路，全球对话可以透过其他国家在不同背景下对物价上涨所采取的各地策略和经验，刺激这个领域的发展。■

來信寄至：

María Clara Hernández

<mariaclaraher@gmail.com>

Mariana Luzzi

<mluzzi@unsam.edu.ar>

> 树薯如何维持厄瓜多尔人的生活安定？

Cristina Cielo 和 Cristina Vera,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FLACSO), 厄瓜多尔



生产者收集树薯。
来源：厄瓜多尔农牧部。

长期处于生存需求未得满足而不稳定的群体，如何维持生计？除了努力找寻物质生存外，他们如何同时透过社会意义层面来滋养自身？他们客观与主观为了维持生活和外在所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认为，社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改善他们在生活危难时的经验。法语中，「美好生活」(la vie chère) 一词涵盖了情感关系、集体价值和高物价，强调从多元角度理解人们对于生活成本上升的体验和反应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我们指出特定的[情感食物生态](#)会影响人们获得物质生计的可能性。

树薯也被称作 cassava 或 manioc，是一种在厄瓜多尔的亚马逊地区所盛产的块茎类植物。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我们的研究发现树薯与

此地区的关系深深地被专家们如何种植此块茎类植物的知识所影响。在这个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从事全职工作，且他们每月基本收入在 450 美元或以上，而一家四口的每月基础花费为 763 美元。透过此研究，我们试图揭示物质条件相对稀缺的背景下，此区域居民的社会再生产轨迹。从研究结果来看，人们将树薯纳入生计策略的关键在于当地的殖民历史以及对土地和人类的剥削，这些历史塑造了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强化了树薯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关系作用。

> 树薯带来的希望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树薯的研究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树薯原先被视为「穷人作

>>

物」，不过如今这样种族化的污名已逐渐有所转变。树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被广泛种植和消费，其中大部分由经济和生态边缘地区的小农种植。随着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加剧，树薯的抗旱性、在贫瘠、酸性和酸性土壤中易生长能力，以及其能源生产效率（每公顷产量比大米、小麦或玉米能产更高的热量），有望养活全球南方不断增长的人口，更被誉为「[本世纪的根茎类作物](#)」。例如，在巴西贫困人口主要的热量摄取皆源自树薯。自1980年代以来，树薯在全世界的产量增加了三倍，近年更成为奈及利亚产量最高作物。

二十世纪中期的绿色革命，可以说是被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食物需求剧增的状况下所被倡议和推动。不过，它同时也增强了美国在后殖民国家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力。1971年，由世界银行领导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在墨西哥、菲律宾、奈及利亚和哥伦比亚建立了农业研究中心，旨在提高主要作物的产量。1980年代，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与厄瓜多尔国家农业研究所合作，期望促进树薯的生产，并透过其加强地方和国家的发展。在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的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支援下，国家农业研究所的农业科学家在努力提高树薯产量的状况下；另一方面，政府和发展机构也与国际热带农业研究中心协调，鼓励小型企业加工树薯产品，并将其商业化。

> 截然不同的经验：后殖民时代的不平等与「活森林」的对比

倡议组织在厄瓜多尔沿海的马纳比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INIAP 的实验室就设在该地。此地区临海，又邻近可耕种的山谷，殖民时期以来就是农业和商业的重镇。因此，马纳比的土地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所占有——首先是殖民势力，后来是共和党的克里奥人，近年则是被有权力的富裕家庭——长期种植咖啡、可可和香蕉等作物，该地同样受到农业出口经济作物的驱动，并都深化了社会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在地区人们长期缺乏稳定就业的情况下，农业发展计画试图透过树薯经济来缓解这样的不平等现象。

在沿海的马纳比，树薯具有象征意义和经济作用。而在亚马逊地区，自3000多年前树薯就被长期种植，它在原住民的食物、文化和性别关系中佔据截然不同的地位。由当地女性建立和料理的脉轮(Chakras)是模仿森林自然生态来培育多种动植物的系统。树薯在亚马逊脉轮中佔有特殊地位，它是为数不多的被视为亲属(更精确地说，是自己的后代)的产物之一。女性对树薯和脉轮的照料是一种情感劳动，与对自身和集体福祉的照护密不可分。

当地组织最近成功获得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正式认可，将脉轮列为全球重要的农业遗产系统。种植树薯和脉轮的女性体现了原住民运动的反榨取「活森林」精神，以及其永续发展、共生与对宇宙和关系的理解。而能促成这项认可的关键，来自原住民知识份子、学者和人类学家间的共同合作。

> 食物在不同层面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克服危机和不平等现象

疫情和气候危机使全球结构性和地方性的不平等，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中脆弱层面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变得更显而易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迫切地需要相应的解方来应对。即便生产主义仍然是粮食安全和应对措施的主要解决方式，但强调相互依存的跨学科视角使我们能够确定我们在相互关联的种植和消费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组织涵括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性、不同生活圈的成员，以及创造对抗不安定之精神等各种要素。我们透过对食物的情感、生态和政治经济层面的理解，研究永续发展的多样性和造成不平等现象的背景。在应对多重且日益严重的危机时，我们对树薯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凸显了当地历史，以及专家对社会、生物、农业和发展动态的解释如何塑造当代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共同生活和未来的理解，以及协商和理解争议存在的可能性。■

來信寄至：

Cristina Cielo

<mccielo@flacso.edu.ec>

> 粮食供给问题的道德困境

Susana Narotzky,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西班牙。Bibiana Martínez Álvarez,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西班牙。



「公平价格·生产成本。」来源：作者个人档案。

本文所考虑的日常生活成本的具体概念源于「生活成本」(cost of living)一词的解释，它涉及：(1)通货膨胀的宏指标；(2)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农民的成本是否危及他们的生存能力；(3)这成本如何体现在劳动者的工资中，又是否危及了他们的生计。最后，我们强调在个人和家庭——农业劳动者和雇主——以及整个政治共同体(如民族国家或欧盟)之范围内需投入足够的精力以确保社会的再生产。

> 政治经济学与生活的道德成本

「生活成本」在此扩展为表述人们何以维持生计的多重含义与情境，也包含人们在生活中各种实践。而以上的情况，可被转译为道德困

境——存在于人们的身体、环境和政治动员中，并产生我们当今可见、存于生活中之物质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理论探索基于「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框架，强调道德价值、实践和情感在引导经济和政治行为中的核心位置。这个概念的优点在于透过物质供应、资源分配和资本积累来体现道德之价值和义务。总而言之，我们的观点试图将经济的道德面理解为政治经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成为必需品、避免通货膨胀和维持公平

COVID-19 疫情间，西班牙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维持粮食的持续供应和防止过度通胀。在此情况下，食物供给链工作的劳动者和农民被标上了不可或缺的标籤，因为生产链与食物是人

>>

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尽管，将食物称为「必需品」是具功利性质之谈法，但其概念却有明显的道德性。因为，若将他们称之为「必需品」，及是将其指涉为——在一个社群中「本质性的存在」。由这个角度，我们就会将原先讨论经济范畴的对话，转移到「公共财」的领域；接着，从而又将对话转移到探究其道德层面。

劳动者、农民、食品销售公司、消费者和政府从食物供给链中不同的位置来理解粮食供应的道德要求，而这些相互冲突的含义以及它们所鼓励的行动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道德困境」。笔者透过解读以下概念来解决此困境：(1)通货膨胀，一个技术性——即便带有道德色彩——的概念，它说明了政策是否合适、是否具正当性；(2)「价格正义」，则是由农民的论述和动员中逐渐成形的概念；(3)「公平工资」，一个以维持合理生计为核心的目标，它为许多劳动者的抗争提供了依据。无论是农民对「价格正义」的呼吁，还是劳动者对「公平工资」的要求，都非新闻。新的消息是公众对消费者的关注，在大多数家庭失业、休假和收入普遍减少的情况下，避免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通膨压力的重要性。

我们刚发表在《[国际社会学](#)》中的文章分析了西班牙食品，尤其是生鲜食品的通膨数据，从2020年的负通膨期一直到现在。2020年，欧洲进入封城状态，多数消费骤然停止和下降，这带来两大后果：第一，人们的收入因失业或休假而减少；第二，人们的主要支出集中在与生活相关的基本项目上，其中以食品项目的消费最为突出。疫情大爆发的头几个月里，劳动力短缺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主因，不过随封城的结束，这论据即失去说服力。疫情通膨飙升才与投入成本（燃料、化肥、劳动力）的增加以及影响产量的干旱相关。然而，农民指责生产链导致价格上涨，即使农场之交货价格是稳定的；他们当时提出需要「价格正义」的要求，并相互响应与动员支持此运动。我们根据农民与消费者协会共同编制的指数，分析从农场到消费者销售点的价格链，以评估价格变化，并将其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论述进行比较，以具体显示其中的道德纠葛。

> 农业劳动、供给和人类生活的物质和道德价值

农民指出，最近最低工资的提高是危及其生活方式和家庭社会再生产的因素之一，并导致通货膨胀。对生计的担忧，强烈显现了农民因透过日薪打工维持生活之剥削情况。然而，农业劳动者要求「公平工资」，并谴责农民的不守规范的行为。农业劳动者所说的「公平」概念指的是生活工资、工作条件和受到尊重，其包含复杂的评价过程，并涵盖了物质与道德标准，这些标准也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虽然日薪打工的生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牺牲」，但也彰显了农民为为打平生活实际成本所做之努力。

我们的文章探讨了「生活成本」三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并分析食品供应此关键领域的三个方面：通货膨胀、价格的不正义和工资的不公平。由于食品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需求品，除了后疫情时代的通膨压力（主要归因于供应链压力和能源价格的环境因素）外，我们同时反思维持生活的系统性成本如何变得如此昂贵。当代生活所需的种种成本，是偶然事件？或是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它是被建构和根植于我们的经济结构中？

接着，我们不仅要探问：那么生活的成本究竟所需多少？在生活成本如此昂贵的状况下，哪些生命又成为了牺牲品？而以努力谋生来说，它又如何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所分析的，生活中的实践总是充满了关于——何为对社会最好的道德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各有不同。然而，这些道德性既体现在不同的量化指标中，也展现于描绘人类行为的话语属性中：正义、尊严和公平。这些证据汇聚在实现「更好的生活」之抗争当中，意即我们所追求的是：以较小的代价和减少牺牲来维持生计与实现生活的可能性。社会再生产的道德两难就在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即生活成本对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意味着什么。■

來信寄至：

Susana Narotzky

<narotzky@ub.edu>

> 追踪马达加斯加的生活成本

Florent Bédécarrats,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 法国。
 Flore Dazet, EHESS Paris, 法国。 Isabelle Guérin, Mireille Razafindrakoto,
 François Roubaud, IRD, 法国。



马达加斯加马宗加市场。
 来源: Fleur28/Wikimedia Commons。

测量一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对于了解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目前学者们对如何解释「成本」各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涉及价值观、技术、资源和权力动态关系，因此有很高的复杂性和争议。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经常被作为生活成本的主要代表，其数据能反映、影响与形塑当前的经济状况。消费者物价指数常被用为衡量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尤其在衡量贫穷率和购买力平价方面，其能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它也能充当 GDP 平减指数，用以测量非正规部门的部分。更甚，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有助于薪资、退休金和社会转移支付的指数化和谈判，以及更能援助计画和财政义务的建构。过去的研究探讨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已开发国家和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下的社会历史，揭示了它在形成福利国家和工资条例方面的重要影响。这组研究深入探讨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社会行动者，以及私营和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作用如何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发展与应用。

> 以马达加斯加为例：三个指标，是不够完善和不足以令人满意的代表

然而，在了解碎片化的经济体和弱小国家如何编制和使用生活成本指标方面，仍存在巨大鸿沟。为了弥补此鸿沟，因此本文以马达加斯加为研究对象：马达加斯加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并且由于自给自足的耕作、狩猎和采集，马达加斯加部分区域是脱离市场的。其兼具长期粮食不安全、极端贫穷和援助制度下的脆弱国家等特质。我们的研究采用多种资料来源，包括我们自己作为马达加斯加统计数据制作者的（反身性）经验，与对自行制作数据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对于在生产和使用参与价格数据上行动者的访谈。

我们的分析揭示了掌握生活成本的三种方式：国家统计局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其被用于宏观之经济指导，以及与国际捐助者的谈判。也被

>>

用于其另类分析，而有时是关注贫穷和不平等的研究团队之调查；或是也被用在人道援助行动者的指标和调查，旨在指导援助分配，关注面临饥荒风险的地区和人群。然而，我们对指标的发展和使用提出了质疑，认为它是一种不完善、不足以令人满意的生活成本代用指标，并表明技术模式反映了对什么算数、谁算数或是否算数，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另外，也同时显示谁在治理，以及治理之目的。

> 专家经济与人道主义之解释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专家将生活费用定义为平均消费价格，可适用于其国内之范围。然而在马达加斯加，专家们即使努力试图符合马达加斯加的国情，但消费者物价指数反映的仍是片面的现实，倾向正规经济和富裕的城市人口，并以过时的消费行为为基础，忽视了公共服务的失败和降级，以及由此民众需付出的各种代价（额外的价格、其有用性或福利的失去，抑或时间损失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统计专家们意识到了这样的缺陷，但长期缺乏人力和财力资源的状况下，限制了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专门研究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将生活成本定义为个人（或家庭）消费行为的结果，而这些消费行为会因社会群体、空间和时间而异。特定的统计调查会依照当地情况，而有所不同重点。例如，为了因应危机，人们采取更广泛不同的家庭消费实践、农村家庭特殊的消费方式、至关重要的私人消费、公共服务的恶化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在福利上之损失。

人道主义行动者将生活费用定义为，避免营养不良所需的最低生理成本。他们产出自身之调查（包括价格问卷）、数据和指标，就技术性程度（即使与适用于消费者物价指数之「最佳做法」相去甚远），但单就专门用于此任务的资源而言，这项调查可以说是既丰富又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为参与式观察做出了努力，但这些调查很难转化为数字，当地居民往往根据自己的公正标准，违反人道主义政策和干预措施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

> 在政府各自为政，和国家多样性的情况下无法完成之任务

每种形式的专业知识都有其存在之理由。这些知识的推动者，他们很少被其弱点和数字的限制所迷惑，因为他们有自身的使命与想完成之目标。他们测量他们实际想测量的，以及他们所能测量的。与其他任何类型的数字相似，他们产生的数字既能解释现实，又能使现实清晰可见，还能塑造政治的更多可能性。除了关于什么算数和什么应该被算数的价值观之多样性以外，生活费用在数字多样性上还说明了一种分散的政府模式，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价格数据缺乏合法性，反映出马达加斯加国家的合法性薄弱，并将其具体化，授权和鼓励援助机构编制自己的数据。结果形成了一种自我平静的动态，在此动态中，我们可以看见其所产生的数据，既证明了立刻采取行动的迫切性，同时证明了人道主义和发展行动者的不可或缺性。

大量的指标和分析也反映了该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碎片化特性。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指「全国性」的状况，但在此，却只代表了人口和经济（城市和市场经济）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称呼此国家为一个完整经济体，以多个独立的经济体来描述马达加斯加状况会更合理；并且，在某些状况下，它们甚至有不可比拟为经济体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多元性，研究团队和人道主义行动者付出了大量努力，有时是单独行动，有时是合作行动。然而，在非正规经济、自我消费、社会和象征性支出、狩猎和采集是生计和生活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这些努力无法解释生活成本的特殊性。

随着自然保护政策的兴起，这些问题已不容忽视。马达加斯加的保护政策有其远大目标，严重威胁许多村民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到目前为止，最贫穷的人已经在为偏颇和近似的价格指数付出代价，如果不采用更好的方法来分析生活成本，包括考虑尊严和生活价值方面等因素，目前的情况只可能会更加地恶化。■

來信寄至：

Florent Bédécarrats

<florent.bedecarrats@ird.fr>

> 价格补贴在摩洛哥的影响力

Boris Samuel,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与 Institut des Mondes Africains, 法国。 Beatrice Ferlaino, University of Bologna, 义大利。



来源：作者个人档案。

社 运行者称之为「补偿」的摩洛哥补贴制度，其作为一种「战略」帮助政府组织指定的产品市场。主因是：丁烷、面粉、面包和糖，以上这些产品对家庭购买力而言具相当的重要性。本研究由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此制度进行分析。事实上，此制度一直以来饱受批评，虽然政府曾经一再承诺将会将其废除，但它却持续实行至今。「补偿」制度诞生的背景，

源于法国殖民母国在二战(1941 年)通货膨胀之情况下采取的定价政策，并支配着产品的消费、生产和营销。它是「粮仓国家」(État grenier)的化身，透过确保温饱与防止社会动盪，使其政权在人民心目合法化。而本研究证实，摩洛哥的补贴制度是经过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之批评且存留下了的制度，它能够透过支持他的权力关系，来被分析和理解。

> 对于基本产品之补贴

摩洛哥对基本产品的补贴涉及多种机制，并根据不同产品，如：鲜花、糖、食用油或丁烷气（以及燃料，直到 2015 年该行业自由化为止）等，传达出不一样之经济议题。「补偿」一词也被许多的行动者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意涵；这些意涵往往与国家维持家庭购买力的关注，以及大型经济集团追求利润的租界逻辑有所关联。国家透过市场进行干预，可以调节经济和政治竞争，或是政治联盟，尤其是与皇室有关的竞争与联盟。然而，「补偿」一词的使用也可能偏离其严格的官方含义。例如，政府为维持面包价格的低廉和稳定而支付的费用，并没有被正式被称为补偿费用。尽管在社运行动者看来，这些费用即是此项政策的其中一部分。摩洛哥的补偿政策植根于行使权力的历史，用来分类「补偿」的类别具有本位的意涵存在。

> 官僚主义式的补偿机制

政治领域中，存在着官僚式的补偿机制；特别是「价格结构」框架了行动者的行为实践，是当代摩洛哥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深具官僚主义精神的补偿和财务程序强化或建立了部门内的等级制度：例如，在谷物部门，给予农民的奖金确保了种子生产商的利润。补贴的计算方式似乎也允许获得可疑的利润，如在丁烷行业，表明公共当局对公共资源的诈欺、佔用，被一定程度地容忍了。最后，价格管理机制使经营者能够获得与国家结盟的认可；例如，面粉市场中，全国与撒哈拉地区的两种补贴面粉制度之间的差异，即体现于补贴的价值上——目前最重要的补贴留给了 Casablanca 面粉产业。由于补贴的使用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和竞争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政治关系中，补贴制度起了不同势力方在重新谈判上重要的中介作用。

> 价格补贴之历史

事实上，价格补贴的历史等同于一部改革史，其政治合法性不断地在改变。20 世纪的 80 年代初，布列敦森林机构认为补助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惠及贫困家庭。但补偿改革因 1981 与 1984 年所谓「面包动乱」中表达的反对意见而中断。

然而，直到 1990 年代末，政府行为仍不断持续在削弱该制度的广度。本世纪的头十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实行了一些措施，目的是以针对最贫困地区和家庭的转移支付逐步取代补贴。但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后，他们尝试压制补偿的想法，将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想法将根植于人们、国际组织与评级机构中。然而，简单地维持补偿现状的想法，与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其实并不相关。

本世纪初，改革的合理性增加。数不清的技术研究指出，补偿管理有多么地不透明、不平等——最富有的 20% 人口获得了 75% 的补偿。关于补贴改革的辩论也使党派政治结构化。公正与发展党的 Abdelilah Benkirane 于 2011 至 2017 年担任总理，他以压制补偿用来支持针对性的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他未来上台后将执行此政策的主要战斗口号。由此，将补偿改革理解为转型与复原时期的一部分，而不是标志着从国家干预主义时代，过渡到自由市场时代这样的线性拆解，似乎更为恰当。

> 抗议物价上涨

抗议物价上涨，通常被指为对昂贵生活支出的机械式反应，是对政治秩序更广泛的挑战，且在摩洛哥历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981 至 1990 年「les années de plomb」（又称作「lead years」）的时期，全国 50 个城镇发生「面包骚乱」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其源自面包价格上涨，所引发的无组织暴力事件。然而，由政治运动组织的示威游行却遭到当局严厉镇压。此次的事件，即使得人们对哈桑二世政权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了广泛和严重的质疑。这些示威是对多年来严重的政治暴力，以及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的回应。价格是表达抗议的一种特殊手段。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对政府而言，支持购买力的行动也是一种展示国家对公民仁慈的方式。面对质疑，实施补贴制度，成为常见的反制措施。■

來信寄至：

Boris Samuel

<boris.samuel@ird.fr>

> 战争时期的粮食安全 以俄罗斯为例

Caroline Dufy, Sciences Po Bordeaux、Centre Émile Durkheim, 法国



来源: Marcson / Pixabay

粮食安全是消除饥饿和赤贫运动的基石，也是国际发展组织明订的千禧年发展目标之一。粮食安全的概念复杂而多面，1996年联合国世界粮食高峰会以四大基础说明其定义：粮食的可得性、取用粮食的机会与可能性，以及建立在以上情况之下粮食的稳定性。

尽管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接连发生的危机使此目标受到威胁。无

论是金融危机、健康相关之危机，抑或地缘政治危机，它们都与粮食价格的显著变动息息相关。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新点燃了粮食短缺的风险，我们看到了全球南部的饥饿骚乱、全球北部的通货膨胀，以及代表全球粮仓的黑海周围战区在生产和供应方面的中断。在如此的背景下，从农业市场、生产和贸易所面临风险的角度来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在国际的辩论中重新占据了重要地位。自2014年以来，欧洲战火重燃，这使人们对这项承诺的优先顺序产生了疑问：我

>>

们讨论粮食不安全问题时，此议题的讨论范围如何被构框？我们应该将目光聚焦于哪群人们之上？战争又是否改变人们原先动员粮食安全问题的方式？

> 俄罗斯的粮食安全议题：统治阶层的修辞建构与合法化策略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所挑选的背景是自2014年以来入侵乌克兰的当代俄罗斯。并且，俄罗斯同时作为一个全球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粮食出口国。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为论述分析，奠基于2015年至2018年间，笔者于俄罗斯农业世界所进行的之初步田野调查，以及2022年以来俄罗斯中央当局（主要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和安全会议）之公开演讲。

讨论公共问题的理论途径显示，农村的社会运动者在动员方式的改变促进另类模式的出现。例如，南美洲的农民之路运动倡导农民社区对于拥有粮食主权的议题。因此，如何确定公共问题的框架可以为情况和相关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定义，成为社会运动者在认知、论证和政治方面的工作结果，他们试图使讨论聚焦于特定之问题意识。

依循实践社会学之结论，本研究将俄罗斯的粮食安全视为一种修辞结构和统治阶层的合法化其政策之策略。在此背景下，我强调三个具体特征——首先，该论述是广义的「政治共同点」，透过权力或主权概念来阐述。此外，这种论述依赖国际背景，将「我们」与全球的「他们」区分开来。透过将公共问题历史化，可以解释从本世纪头十年，基于全球化粮食安全概念到农业食品问题国家化的转变。最后，透过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的农业和粮食政策，来理解此论述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以上，我们得以理解自2014年以来，促进替代从西方国家进口农业食品的政策如何促使粮食问题的国有化和国家农业出口实力的恢复。

> 持续改变的论述与竞逐的粮食安全观点

2014年以来，俄罗斯身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中成员，它以身为全球粮食出口国而拥有话语强权的地位已经转变了。如今，以支持粮食独立为基础的国家，持有更多的政治言论权力。拥有这样的转变，归因于国际制裁制度的关键作用，另外，2022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强化了这样的转变。

2022年7月，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庇护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粮食协议，在高强度战争的背景和地区创造了人道主义的特例。其背后的意图是促进世界市场的谷物出口，缓解价格压力。俄罗斯公开谴责该协议，并拒绝将其延长至2023年春季后。

上述不同国家断裂的观点与意见，凸显了两种粮食安全观点的对立：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前者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普遍繁荣、成长和正和游戏的因素；且它得到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支持。这种观点在本世纪初十年，引领俄罗斯走向农业的现代化。后者是专制主义和生产主义，以权力和零和赛局为支持。意指商品流通由国家组织和控制，而此为当代俄罗斯行政部门提出的最新说法，并且2014年以来，这种说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几乎没有受任何其他论点的挑战，即使有，也是被边缘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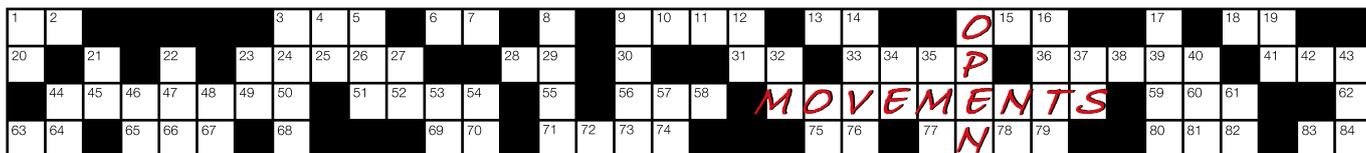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Caroline Dufy

<c.dufy@sciencespo Bordeaux.fr>

> 开放行动：公共与全球社会学平台

Breno Bríngel,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以及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Geoffrey Pleyers**, FNRS 和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比利时, 以及ISA会长 (2023-27)



来源: Raul Pau

气候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可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在全球峰会期间,各国政府只表现的缺乏能力与意愿来解决这个急迫的问题。民主在世界的各个区域皆受到严重的威胁。技术官僚进行重大的贸易谈判,而公民鲜少能对这些决策造成影响。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与极右派运动被推动。仇恨言论与不容异己的现象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种族主义、仇恨犯罪以及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我们已经进入到更复杂的局势,各种危机环环相扣且互相强化,挑战着以无限增长、进步和发展为基础的文明模式。此外,世界上的危机对每个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国际乐施会在《[2024年乐施会不平等报告](#)》中指出,从202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个人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同一时间,世界上有近乎五十亿人变得更贫穷。不平等达到了历史新高。

这些挑战提醒我们,社会运动是我们社会的关键行动者。在西方与东方,反动、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与极右派运动正愈演愈烈,他们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所有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曾见证民主抗议的国家现在都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即便是在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也受到打压,记者被杀害,公民受到国家监控。

但这种惨澹的景象并非全貌。选择的余地仍然存在,但往往是隐形的,特别是在缺乏公开抗议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地,深刻的社会运动和新型态的激进主义与民主实践也在不断涌现,它们使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并挑战了我们关于行动主义、社会运动和「民主是什么」的传统观点。公民占领广场与网路去组织、传播他们的资讯,推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他们认为民主不仅是民意调查或是向政府提出要求,也是在主张社会正义与尊严,同时也是他们在其活动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所履行的个人承诺。

> 社会运动: 抗议、替代方案和知识

我们《全球对话》的全新专题「开放行动 (openMovements)」旨在为分析全球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及其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个真正的空间,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将讨论运动的成功、侷限以及许多运动所面临的反弹。我们将从社会运动中学习,并也与社会运动一起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在地方、国家和全球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于进步/民主方或是反动的一方,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生产与变革的重要行动者。社会运动影响着实际政策也改变文化,

>>

借由在各大洲的抗争与社会实验，它们生产知识并集体学习。它们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为不同的未来开展出前景。

虽然抗争可能会在主流媒体上获得一些关注，但它们只是社会运动的冰山一角。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面向包含大众教育、实际的团结、积极的公民意识、日常生活中的转变与主体性。开放运动将欢迎有关抗争与具体的替代方案的各种贡献。

> 全球社会学

ISA的核心是开展全球对话，向不同大陆的社会学家与行动者学习。作为《全球对话》的一个新的专题，开放运动通过提出来自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各地区社会学家的分析，促进理解这些社会变革的全球观点。我们相信，从不同大陆的社会运动、危机和另类经验中学习，能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国家与地区的现实、民主的挑战与实现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可能途径。

我们提倡以全球观点来看待世界的变革，为此，借由促进不同声音、不同世代、不同观点、传统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对话，避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放眼全球并不代表要忽略地方或国家的抗争，相反的，对地方、国家和区域层级社会运动与挑战的分析，是全面理解全球前景的基础。我们试图揭示根植于当地现实和斗争的替代性实验，这些实现可能能够激励各大洲的行动者，并展示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为读者提供理解发生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抗争浪潮或危机的关键，这些事件虽然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学到很多。我们也将关注地方或国家行动者如何在国际间相互串连，进而可能影响全球。我们希望促进抗争的理论、实践、符号和剧码在世界各地传播。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行动者和挑战，我们需要将行动规模与分析层次相结合。正确的全球视野需要在不同地区进行多地点的实地考察，充分融入当地、国家、区域和国际现实。社会运动受到这些不同领域的背景与行动者的影响，但它们也有助于决定地方、国家和全球的现实。尽管地方运动常被简化为地方冲突，但向今年刚庆祝三十周年的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Zapatista)这样的运动表明了它们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借由

开放运动，我们想了解激进主义的抗争与文化如何在国界之外产生共鸣，以及跨国网路如何影响国内与国际政治。

> 公共社会学

社会科学家可以在民主的公共空间中做出特殊贡献。《全球对话》与开放运动可以协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要了解抗争的特点、利害关系与挑战，以及主流报纸所报导的直接事件以外的冲突，就需要科学的严谨性和长期的实证实地调查。因此，我们必须开闢一个空间，让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能够通过通俗易懂的文本向学术界以外的广大读者传播他们的成果与观点。

对于开放运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将社会运动社会学与普通社会学联系起来，制定避免「专业」社会学家过度专业化和过度知识化的方法。正如ISA前会长和《全球对话》创始人[Michael Burawoy](#)所提出的，公共社会学致力于让社会学与学术圈以外的受众对话，在开放的对话中，双方都能加深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 开放行动的新进展

开放运动是我们在2015年三月创立的一个编辑计画，最初发布于首屈一指的独立媒体「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开放运动旨在三个面向「开放社会运动」：

- *将社会运动分析与广泛的社会变革串连起来，将社会运动研究视为更清楚理解特定社会运动者和整个社会的关键因素。
- *培养全球视野，特别聚焦于全球南方的经验以及透过世界各地的抗争来共同学习的能力。
- *为学者和行动者开闢对话空间，为公共社会学作出贡献。

2015到2021年《[开放民主](#)》专题中，开放运动已发表约250篇文章，这些文章来自三十个国家的行动者和学者。得益于简洁格式、清楚分析和动态的线上出版平台，各大洲的研究人员、数以万计的公民、记者、行动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是这专题的读者。其中有些文章的撰写是为了干预近期的公共辩论，其不只是观点，而是严谨的分析。我们也会在公共辩论与学术界中纳入过往难以听见或代表性不足的声音。

有些文章被客座编辑出版成系列文章(像是移民危机、新的镇压剧码、重塑左派或疫情期间的社会运动等相关)。这些精选文章已经在五本英文或西班牙文书籍中再版,所有书籍均为开放获取:《[全球的抗议与怒火](#)》(2017);《[墨西哥的运动](#)》(2017);《[全球警报:疫情其间存在争议的政策、社会运动与未来](#)》(2020);《[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运动与政治](#)》(2022);《[智利的运动](#)》(2023)。

在这个初始阶段之后,开放运动将在《全球对话》的框架内开始新的阶段,找寻方法以更制度化的方式,将在世界领先的社会学协会与不同群众间建立桥樑。在这个阶段,有两项新的发展被加入到原有精神的基础上。首先,我们力求提供一个动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文章会先以英文发表在《全球对话》的网站上。部分文章会被纳入其中一份期刊中,并有十几种语言的翻译。其次,我们不只与单一的传播平台对接,而会跟世界各地的数位媒体合作,将杂志内容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

欢迎大家投稿到这个专题。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客座编辑来汇整来自各大洲的行动者与社会科学家对特定主题发表的文章。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投稿与近期事件和世界政治发烧话题相关的短文,这些短文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实地考察成果。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移动式的公共和全球社会学来理解和面对我们所经历的所有历史的挑战。这就是开放运动一直在做的事,也是它的目标。■

与开放行动相关事宜,来信寄至:

全球对话团队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如何研究并理解民众抗争？

Laurence Cox, Maynooth University, 爱尔兰 · Alberto Arribas Lozano,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 Sutapa Chattopadhyay,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加拿大



2003 年于印度参加抗议游行的 Baiga 妇女和儿童。来源：Simon Williams, Ekta Parishad / Wikimedia Commons。

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世界历史充斥着社会运动：对抗帝国的抗争产生了一个后殖民民族国家的世界，如今在许多地方都遭受严厉攻击的争取民主的战争，从根底上挑战了父权制的女性及 LGBTQ+ 运动、移民及反种族主义活动、失/能及精神健康者的抗争、反战运动、诸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抗争——包括教育并研究门路的民主化——等等。

社会运动研究在如此处境下蓬勃发展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们如何才能确实做好这些研究？在与 Anna Szolucha (目前正在从事田野调查) 共同编辑的 [十年来第一本运动研究方法手册](#) 中，我们特别专注于参与式研究、全球南方以及新研究员的照顾。

> 参与式的与常规的研究

方法手册通常是纯粹集中学术生产的工具。然而，社会运动却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比如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酷儿或解殖)的发展上扮演着关键角色。运动研究因此是个特殊的领域，在其中，学者们为了维护其学科的体面，组织中具有自己教育、理论和研究活动的从事者都经常被排除到讨论之外。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先前的手册要不是纯科学基调就是过于理论化的，即呈现出了激进的方法但同时设置了学术训练和背景的门槛。

我们尝试过不同的方式，同时邀请了在严谨的学术背景下工作的作者以及从事运动的研究人员并具有协作和不同的参与式研究方法之经验的人一起贡献章节。我们感到其结果是更好地体现了运动研究的实际丰富与创意，以及许多研究员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我们特别高兴可以拥有一个专门讨论运动研究之「应用」的项目：运动能如何利用研究(任何类型的)呢？很多时候，这个问题要嘛被忽视要嘛被呈现为高度抽象的理想，而不是探索运动

以及参与研究员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是有趣的、具挑战性的并且是把研究做得更好的必要起点。

> 全球南方和北方的运动

和许多事一样，对于如何研究运动的写作一直由全球北方主导——尽管全球南方有多得多，并且通常是更大规模的运动。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作者还是主题，在这个领域里每一本（英语的）手册都集中于北美或西欧，尽管在拉丁美洲、印度和南非等地长期以来一直有「社会运动」框架内对于民众抗争的研究。

我们达成共识要从更为全球化的视角来编辑一本新手册（十年来的第一本通用手册）——尽管我们不会声称已完全地解殖。即便为翻译而寻找独立资金，并为非英语母语的使用者进行了大量的副本编辑工作，也无法克服英语在全球学术界日益集中化所造成的问题。与此同时，持续存在的研究资金不平等意味着那些运动通常不特别重要的较小国家（如英国）在全球学术出版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高兴能推出第一本包含了来自不同大陆（除了南极洲）的作者和主题的手册，对全球南方、原住民等视野下的运动研究进行了强调。这是迈向更诚实和有用的全球运动研究最佳实践图景的第一步。

> 支持新近研究员

最后，社会学家对于已在此领域的人如何协助他人入门以及这些运作通常想得不够。例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希望从事运动研究的研究生往往不会在本科教学中受到有关运动研究之困难与挑战的教育——且除非现有的赞助人将他们招募到预先计划的项目中，否则他们还需要在没有大学图书馆权限的情况下去撰写研究

或募资计划书。因此，新近人员通常只有很小的空间来了解运动研究的磅礴多样性，并且倾向于复制他们都已实际遇到的任何内容。与强大的独立研究传统没有什么联系的基于运动的研究人员（movement-based researchers）待遇更为糟糕。

据上述，我们非常高兴出版商愿意将我们的引言（长达一万两千字）免费在线提供。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民主化对可能性的完整范围的访问，同时为全球南方的运动人士、大学体制外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获取通常需要付费的材料打开所有常用方式的大门。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努力与作者们合作以确保那些章节能够对此领域的新人们——包括可能已经离开教育界数十年、没接受过精英教育、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以及那些被照顾责任、政治抗争或工作压力等等许多方面引开注意力的人——开放。做好研究始终需要付出努力，但撰写方法不应该具有排除式地炫耀文化资本的意味。

编辑这样一本著作的经验是非凡而动人的，揭示了在许多不同运动、地理和学术空间中正在进行的一些极富创意的、启发性和坚定的作品。全球北方的知名学者、全球南方的重要人物、运动人士研究员以及初级职业研究员都对这个项目作出了有力且慷慨的回应。我们认为这个系列展示了研究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的许多最佳方式之一，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激励新近人员来加入这场不断进行着的对话以及学者之间的对话中。■

來信寄至：

Laurence Cox

<laurence.cox@mu.ie>

Twitter: [@ceesa_ma](https://twitter.com/ceesa_ma)

> 玛雅影视实践与知识的去中心化

Carlos Y. Flores,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orelos, 墨西哥



来源: Carlos Flores, 2006。

自 1990年代以来,我一直与瓜地马拉的玛雅社区组织合作展开影视项目。当这些项目启动时,该国正在走出长达36年的内战,这场内战结束于1996年并造成近二十万人的死亡及超过四万五千人的失踪,其中大多数是原住民社区的平民。在武装冲突所带来的这一无可抵抗的影响之后,玛雅社会运动及组织重新出现并向非原住民政府要求权利和正义。影视在某些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工具,不仅用于强化社群认同和政治主张,还用于对抗佔支配地位的,关于他们生活、政治以及文化实践的非原住民叙事。

作为受训于西方的视觉人类学家,我的角色是主要透过使用项目参与者的摄影工作来帮助他们构成视觉材料的叙事,并与他们讨论向不同公众传达讯息的关键的编辑过程。首先在玛雅凯克奇社区(Maya-Q'eqchi')并随后在玛雅基切社区(Maya-K'iche'),我们制作了几部有关文化实践、记忆和战争中遇害村民的正义的纪录片,最后我们也说明了争取法律自治和尊重自身法律形式和争端解决的斗争。然而,我从与玛雅社区的影视协作的这些经验中逐渐意识到,这样的合作产出远非单纯,其涉及了复杂的互动的理解,尤其当我们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为彼此塑造了对项目的不同期望。

>>

> 现代／殖民之遗绪

有两个基本维度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不仅仅是我个人与玛雅组织的协作，还影响了许多研究社会运动（特别是在所谓的全球南方）的研究员的努力。这两个基本维度是现代性和殖民主义：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的，此乃同一个西方扩张之进程的两面。一方面，根据以科学真理为基础的所谓客观立场，现代性传统倾向于发展特定的标准和制度性的论述来为自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建构支配性提案；不过这并不一定相应于那些田野中的人构建他们现实的方式。另一方面，殖民主义除了归化（naturalizing）那不仅是差异的且生活在各自独立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文化「他人」的存在，还同时在田野主体与其研究员之间引起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样的分离经常起到强迫支配、征服和文化差异的编码的作用。

根据这样的逻辑，在西方自由／启蒙思想中型塑的全球精英已历史性地将他们从那些被宣布和定义的文化「他人」中间将自身确立为标准的公民。这一被指定的此等性（subalternity）身份已经被自然化，并透过强加一种据称能够建构客观现实的「普遍性」而成为近乎隐形的。很清楚，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田野主体与研究员之间的互动已经历了一种能力——即从那些权力中心的视野坚持自身关于生活和社区的观点的能力——的减弱。

与玛雅影片制作人合作建构视听材料帮助我了解到权力关系是如何概念地定义了任何社会中事情被理解或不被理解的方式的，而这又反过来使某些知识的形式相对于其它显得有效和优先。举例而言，玛雅影片制作人和社区当局将玛雅玛雅基切社区的法律实践理解为一种基于玛雅价值、原则和世界观的整体系统，这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将原住民法律描绘为「粗暴的正义」不同。

> 新取徑

在这种知识主导的背景下，社会科学中的自身反省和修正主义视角正在针对视觉研究的客体、目标和方法发展批判性和富有成效的观点。现如今可以来重思关系与合作的新形式，这将在视觉研究计划中产生更多的创意实践的专案。研究人员和文化「他人」之间的分歧也被削弱：逐渐增多的研究员要嘛与他们所研究的社区合作开展项目，要嘛对这些社区保持不同程度的归属感。他们的实践受到他们的文化认同、学术训练和政治位置所影响。如此的转变将带来这样的承诺，即这类研究计划中的参与者之间有更少的等级制和更多的横向交往，虽然并不总能实现。

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优先考虑书面文本，这是那些文化水平或不熟悉现代性占主导地位的修辞和框架的社区所难以通达的。而社会研究中对视听资源的使用因此对帮助缩减参与者与研究计划之间的距离有特定的重要性，因为它能促进研究成果的合作构建并提供遭逢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经验的人们的观点的空间。这类型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与基于书面文字的世界有不同关系的受众中更广泛地传播。研究员与当地社区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使用视听媒体的许多合作经验有可能更好地支持社会运动，以便捍卫他们教育、政治、经济、领土、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的兴趣和主张。

因此，关键在于建立和社会地认证一种实践方式的可能性，在这种实践中另外的认识论——在此即玛雅人的宣称——以及协作的和文本际（intertextual）的影片可以被清楚地表明出来。这种理解现实的方式不应被认为是与支配性规范具有根本的不同或几乎是不可相比的。毋宁说，挑战在于去中心化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以及对生活世界——这些生活世界存在于主流文化的边缘——的认证。■

來信寄至：

Carlos Y. Flores
<carlosyflores@aol.com>

> 冲突持续扩大——残忍的以巴战争

Lev Grinberg,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以色列, 与 Dartmouth College, 美国



「战争没有赢家。」来源:Zo Haderech。

十月七日，哈马斯屠杀以色列的平民、强奸妇女、肢解和焚烧尸体，这其中不乏儿童和老人在内。而以色列民中的反应是「别跟我提佔领和加萨围城战的背景，忘了殖民主义和定居殖民主义的批判理论吧」。

以色列军方轰炸和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摧毁了整个街区，19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乡。不过，以色列民众似乎自动去脉络和遗忘了这些历史背景。在此情况下，去脉络化等同无视哈马斯和圣战士在以色列南部对平民的残害与屠杀，甚至，他们辩称根本未曾发生屠杀。尽管哈马斯战斗机拍摄的影片表明了他们的这些暴行，其目的是以我称之为 ISIS 风格的方式，恐吓以色列人。

我们必须明确表态自己的道德立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蓄意杀害平民的行为辩解，因为这犯了战争罪。此外，我认为道德态度与政治态度并不矛盾。我以分析以巴的案例提出的[动态政治空间理论](#)，旨在论述政治开放和暴力选择，但也同时明确在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立场显示，我反对暴力。

要分析情况升温的暴力谋杀情况，其背景显得更重要。它既有助于理解导致当前暴力循环的起点与动机，也有助于进一步遏制暴力的升级。在此，我将简明地解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是如何被宗教狂热精英所控制，他们随时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直到取得最终胜利。这是哈马斯领导阶层和以色列政府曾公开声明的目标，对两国人民和该地区都是一场灾难。而本文最后，将提到和平结束当前战争的可能性。

>>

> 理论背景

[Michael Mann](#) 对17起种族清洗谋杀案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族群感到受到威胁时就可能发生种族清洗,其中涉及三个政治要素:(1)激进的政治精英;(2)准军事组织;(3)重要的社会支持。而在什么情况下双方会互相发动全面的战争呢?首先,他们需要相信自己能够获胜;其次,他们期望获得外部国际力量的支持。

定居殖民主义尤其凶残,美国和澳洲的情况即是如此。然而,以巴冲突更为复杂,并且还被错误地简化成为定居殖民主义例子。以色列的情况包括两种类型的殖民主义,即定居殖民主义和「典型的」殖民主义,后者包括军事和经济统治。逃离东欧反犹太主义的犹太人,试图在他们曾经的古老家园建立民族国家;同时,巴勒斯坦当地居民,也害怕会因此流离失所/被征服,并随之[反抗](#)——这最后演变成一场民族冲突。而近年来,这两个民族运动都被宗教狂热分子所主导。

若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当前战火爆发的背景,以及10月7日以来当地越演越烈的险境。然而,如果我们忽视此特殊事件在当地的复杂性,那么我们只会离遏制暴力和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之目标日益远去。

> 国际情势

国际情势的背景对于理解双方的策略至关重要。显然,自以色列在加萨周围重署军队的十八年以来,[美国、欧盟和保守的阿拉伯政权](#)一直容忍以色列定期空袭哈马斯,并将其视为合法的自卫行为,而忽视了他们不断袭击与对于对方经济扼杀的背景脉络。

《亚伯拉罕协议》由 Donald Trump 发起,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但它却无视巴勒斯坦的被抑制、征服和压迫。透过检视这份协议,可以理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宗教狂热分子激进化的相关背景:(A)其忽视巴勒斯坦问题,助长以色列政体中极端和扩张主义的趋势,[妄想](#)永远围困加萨,扩大定居点,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们流离失所。(B)针对《亚伯拉罕协议》,哈马斯依靠伊朗支持,试图团结巴勒斯坦人,并领导他们进行民族武装抵抗。

哈马斯在10月7日所执行的大屠杀和以色列的暴力回应,将战火推向了高峰。如今清晰可见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忽视巴勒斯坦问题和加萨令人绝望的情势。只是,鉴于双方都缺乏能够产生和平解决方案的合法政治领导,全球化下的冲突可能会致使相对更积极与能平衡的国际干预。

> 当地背景

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从加萨撤军后,重组对巴勒斯坦人们的控制体系,并建立了被称为「稳定的紧张局势」,意即,此区域有零星的暴力冲突(「回合」暴力冲突),且能是被国际社会所容忍的。在不同的统治体制下,巴勒斯坦人被分为四个政治群体:以色列公民、耶路撒冷居民,以及军事统治下的两个最大群体,分别由哈马斯统治被围困的加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的权力机构(PA)统治的约旦河西岸的城市。

巴勒斯坦政治菁英双方,都对其平民负有行政责任,且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以色列,在行动上依赖军队。他们之间有两大分歧:一方面,法塔赫的权力机构仍致力于《和平协定》期待能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合作,并继续透过外交努力恢复和平谈判,但它同时却不断丧失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哈马斯将政治努力与武装抵抗结合](#),军事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其也声望不断上升。巴勒斯坦公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都处于中立地位,被以色列政权直接或间接支持的专制菁英主导了情势。

以色列公民也因此受制于保守政治菁英所蔑视,且权力分裂的控制体系,以色列公民对未来和平愿景也逐渐失去信心。内塔尼亚胡优先考虑哈马斯,因他在每次暴力对抗中都能赢得民心。只有一种以色列政治力量对未来充满憧憬:救世主狂热分子试图扩大其统治,瓦解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萨的哈马斯统治。

在缺乏其他政治愿景的状况下,[统治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力量](#)出现了主要分歧:一方面,以色列维安精英寻求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持合作,以控制平民人口;另一方面,武装狂热份子的移居殖民者不断尝试取代巴勒斯坦人,并破坏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作。

2019 至 2022 年连续五次的选举，以色列政治体系陷入瘫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与极端主义狂热分子组织，与 anti-Bibi 集团（反纳坦雅胡组织）陷入僵局，后者在缺乏替代政治愿景的情况下利用部落敌意强力反对纳坦雅胡。

2022 年 12 月极端主义联盟成立。反民主立法部以及将部长职能分配给狂热定居者中最极端的领导人 Smotrich 和 Ben Gvir 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民间反政府动员。抗议者与军方精英一致反对狂热定居殖民者，因此预备役部队组织起来，宣布他们拒绝在极端主义政府领导下服役。

几乎所有的安全官员，包括参谋长 Halevi 和安全部长 Galant 都警告纳坦雅胡，内部紧张局势将鼓励 Hamas 发动攻击，但纳坦雅胡却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自 10 月 8 日以来，每日都有人提醒纳坦雅胡他的疏忽，而他的回答是「政治议题」必须推迟到战争结束。显然，在政治层面，他对结束战争没有任何的兴趣；而结束战争也将导致调查委员会将对他的失职进行调查。此外，他的政治夥伴对结束战争也无任何兴趣，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并在撤离地区持续地试图扩大犹太人之定居点。

> 我们如何停止战争并建立另一个和平的愿景？

问题是，当极端分子的统治阶层双方，他们寻求的是彻底击败敌人，那么在两阵营温和派皆无领导权、也无合法性，更没有替代的和平愿景时，我们该如何停止战争？

目前正是国际社会改变对以色列\巴勒斯坦态度的最佳时机：首先，实现停火，交换人质和囚犯；其次，达成不交战 (Hudna) 协议，开始重建加萨；第三，开始在外交和政治中建立信任，同时考虑两个民族的期望：巴勒斯坦的独立需求，以及安抚以色列生存的不安全感。

以本文之观点来看，干预模式应参考由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协商的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而以以巴的案例而言，斡旋者应是美国、埃及和沙乌地阿拉伯，采用超越两国方案的[权力分享](#)模式。■

本文根据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举办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系列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作者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对本文进行了最后修改。

來信寄至：

Lev Grinberg

<grinlev@gmail.com>

> 干预主义国家的奇异回归

Paolo Gerbaudo,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西班牙



来源: Pixabay

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最令人惊讶的全球政治趋势之一是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中的回归。在许多十年里，认为国家在经济中应尽可能少地干预的理念被视为跨党派的信念，我们正在目睹对于需要国家力量的新接受，无论是好是坏。

这种趋势的例子是多样的，有些情况下它们也非常明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影响尚未完全被深入探讨。在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全球自由市场的必要性是强烈的，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新的关税和监管障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国家应该避免干预经济，但现在政府明确地参与工业政策，特别是政府应该决定国家的经济优先顺序、促进技术卓越，并确保资本流向战略性行业的理念。最后，数十年来政治家们逐渐减少了公共投资，导致许多基础设施陷入了破旧，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需要加强公共投资，这

一观点在下世代欧盟投资计划或拜登经济学计划中得以体现，这些计划旨在加速绿色和数位转型。

对于被描述为「新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政治话语和政策变化是否仅应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共识内的一种战术性、或许是暂时性的改变？抑或它们更多地反映了政策方面更为结构性和长期性的转变？迄今，尤其是在左翼和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家中，这些变化大多被视为在根本上保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总体精神的有限路线调整。

相比之下，我认为这些趋势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深刻转变的表现。这些变化表示出，在全球化黄金时代主导政府干预的跨党派协议至少部分要被取代，并且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普遍认为更强大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

然而,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和国家的回归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转变,也不意味着它们像是朝着社会主义的转变。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干预政策是为了富人和大财团的利益而发动。

这种典范转移促使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辩论中变得主导的假设。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主宰的社会,其中无限制的竞争和市场的非人格化机制主导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如最近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市场丝毫不是「自由」的,因为它受到权力寡头的主宰,这些寡头通常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支持。此外,市场机制的实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国家政策」,旨在透过经济手段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现在这种国家干预变得更加明显,这些机制的政治性也变得更加显著,而「自由市场」的幻想也变得更难维持。干预主义的回归带来的知识转变,即它使经济决策的政治性更加明显,可能对政治动员产生重要影响,减少权力持有者声称他们仅仅是在应对市场压力的局部后果的能力。

> 超越「自由市场」的幻想

自1980年代开始扎根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表面上呈现为「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的许多走向将由遵循市场原则来决定,如经济竞争和价格机制。这种社会学描述捕捉到了政治意识形态中最突出的共识点,这个共识点主要是关于美化市场、贬低国家。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关于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从新保守主义者中的「早期采纳者」如 Margaret Thatcher 和 Ronald Reagan,到第三条道路领导人中的模仿者,如 Bill Clinton、Tony Blair 和 Gerhard Schröder。

在当时,许多批评者辩称,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政治家都是新自由主义者,这捕捉到了一个根本性的真相。政治光谱的大部分,无论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都接受了在「新时代」、「历史终结」的时代,或者「后」(后现代、后意识形态、后阶级,引用一些最时尚的表达方式)政治的时代,作为不再是主要工具的国家必须撤退的概念。同时,必须给予「社会」(或更好的说法是「公民社会」,以澄清它是超越国家的社会)和市场

所归因的「自发性」行动自由发挥。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干预,继承自福特主义时代的计划机构、国有企业和综合性社会保障,被认为是限制私人倡议展开的障碍。

一旦观察者从意识形态楼阁的顶端转移到更世俗的政策细节和经济过程层面,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这个蓝图的最重要实施包括经济全球化的爆发。在降低贸易壁垒和消失的资本管制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和投资经历了巨大增长,这两者都是「不干预主义」或「自由放任」的国家的表现。但全球化很少是「自发的」。在每个国家,它的展开都是由积极制定法律的政治家所实现的,他们进行公司私有化、建立自由贸易区域,并「整合」公共财政以使其经济「适应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面临一系列连续的危机(金融、气候和现在的地缘政治),很快就显示出,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完全厌恶整个国家,而是选择性地反对 Poulantzas 所描述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社会民主时代已经发展起来,对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条件进行了许多具体改善负责。如果说有什么,那么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镇压行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等)增加了许多。除了当时最恶名昭着的事件,例如智利的 Pinochet 独裁统治,结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谋杀政治上的对手,我们还目睹了一个「刑罚国家」的兴起,这是[社会学家 Loïc Wacquant](#) 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监禁率上升所记录的。一个国家比较不「社会国家」,意味着一个更具压迫性的国家。

干预被严格限制在「监管」目的上,对任何主动经济政策都抱有怀疑,因为这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即「挑选赢家」和「排挤投资者」。然而,正如监管理论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即所谓的「去监管」也是一种监管形式,但这种监管形式除了显著的经济效果(商品化、垄断的形成等)之外,还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效果:让人们相信经济不是政治领域,而是一个现在完全交由市场力量展开的领域。如果历史上一直存在「市场」——正如经济史的年鉴学派所主张的那样——那么几乎从来没有「自由市场」这样的东西。市场永远嵌入在社会中,如[Polanyi 所主张的那样](#)。在明确的国家干预主义时代,国家可见之手的回归提供丰富的证据打破这个恶劣的神话。

> 新的计划型国家及其政治影响

最近的危机预示着新自由主义所压抑的干预主义国家的回归。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经历的危机已经看到政府采取了比我们习以为常的更积极的角色。一个显着的例子是美国和英国的重大投资计划，它们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并在它们的名称中采用了「计划」的框架。无论哪里，人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计划，涉及气候转型、太阳能、数位化、半导体研究等等。

这些计划通常围绕着各种「任务」展开，这个术语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Mariana Mazzucato提出的，她是「创业型国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理论的倡议者。这似乎与对各种计划和规划的一般怀疑相抵触，这些计划和规划被视为「命令经济」和苏联经济模式失败的残留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芯片技术的重大投资。美国和欧盟已经展开了努力，以在本地生产芯片，而这种生产以前一直集中在东南亚。从纯粹的经济或市场角度来看，这些选择似乎毫无意义：芯片之所以在台湾生产，是因为在那里生产成本更低。但这些选择反映了其他考虑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是「反经济」的，但不能忽视，比如技术优越性、国家安全等。

从一些熟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看，这种回归公共投资和计划项目是显着的。正如Michał Kalecki 所着名地观察到的，资本家厌恶公共投资，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投资决策应该是他们的专利。计划和「计划型国家」是新自由主义者的传统攻击目标，比如 Hayek 和 von Mises，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计划都是一种傲慢的表现，是政治家假装能够决定只有市场才应有权选择的事情。计划并没有被废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转移到了跨国公司，比如沃尔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见之手」的回归必然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例如，拜登经济学可能确实重新强调了公共投资的战略重要性，但它将公共工程外包给私营企业来执行这些项目。此外，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人谈论国家主张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就像战后的干预型国家那样。对于公共所有权对战略性企业的恢复仍然面临着艰巨挑战（尽管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动向）。此外，这种干预型国家的回归受到了强烈争议，正如阿根廷的自由主义政治家Javier Milei的崛起所表明的，他的政治平台正是围绕着对国家在经济中干预的谴责。然而，一次又一次，像Milei这样的政治家发现自己在无法实现的承诺「摧毁国家」上后退，从而揭示了所谓的「自由市场」实际上远非自发性的，而是始终依赖于隐蔽的国家干预。就像以前的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像 Milei 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并不想「摧毁国家」，而是想非法化其民主使用。

如果在当前的「新国家主义者」情境中存在一丝希望，那就是现在「皇帝是赤裸的」。国家介入经济不再被「自由市场」的幻想所遮盖，就像最近的过去一样，国家在结构经济、延续或减轻其不平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现在已经让每个人都看在眼里。这种认识转变可以为进步势力提供新的施压点和行动目标，同时让公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经济不是自然或自发的现象，而是与政治决策深深相关。随着对市场社会的幻想渐渐褪去，我们现在有机会重新思考当前情况下民主政治的样貌。■

來信寄至：

Paolo Gerbaudo

<paolo.gerbaudo@ucm.es>

Twitter: [@paologerbaudo](https://twitter.com/paologerbaudo)

> 菁英政治的威权主义

Fabrizio Maciel, Fluminense Federal University, 巴西



来源: Freepik

菁英政治在现代世界一直被誉是一种优越的道德体系并且可以最有效地打击不平等。对于它的倡议者来说，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向每个人开放了爬上社会阶梯的真实机会从而打破了因出身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的障碍。结果是，为了建造一个更平等更包容的情景，需要做的只是个人的努力和菁英政治社会所提供的机会。

没有比这样的陈述更为误导的了。在我和同事们于巴西——与来自里约热内卢公司的各个层级和部门的高阶高管一起——所从事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我们观察到截然相反的情况。菁英政治不仅在其对社会爬升所作的基本承诺上是易碎且误导的，它骨子里还具有深刻的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的威权主义是隐性的，因此比当今极右倾向的国家政府那明显的权威主义更有效。

> 社会出身、生活方式与政治立场

在得出上述结论以前，我们在可以测试我们的原先假设的三个基本层面上建构和发展了我

们的研究。第一层面是关于基本与阶级出身同义的社会出身。在大约100名高阶主管的样本中(包括线上问卷以及在LinkedIn社会网路上的调查)，我们很快发现其中大多数(大于百分之九十)都出身于巴西的中上阶级。以此，我们认清了特权阶级背景与在劳动阶级中占据高价值位置之间的关联。光是这一事实就与菁英政治所倾向的那种原先主张有所出入。它显示了菁英政治不是民主的，而是任意的，因它隐含着再生产中间或上层阶级的特权条件之动力。Wright Mills 在其对于 1950 年代美国的菁英所进行的出色研究中也达到了相似的结论。

我们研究的第二层面是关于巴西高阶主管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我们调查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并发现《Você S/A》、《Forbes Brasil》、《Exame》该受众群体最喜欢的杂志。经过三年对这些杂志的订阅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材料系统地建构和捍卫我们所称的「市场心态」，这是一种极为菁英式的、保守而威权的心态。深远地来看，对原子化的个人以及个人自由的一贯捍卫，最终的结果都是对威权人格发展的刺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那些在明人高管和企业家的生活

故事中结晶化的市场赢家之自信的讚美，掩盖了这些个体——他们拥有一切却缺乏所占据的声望和权力的位置的资格——的社会出身和特权轨迹。没有比这更威权的了。这是市场威权主义的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形式。

最后，我们研究的第三层面是关于受访者的政治倾向。在这个层面上，市场赢家的想法变得清晰，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当被问及诸如劳动和退休金改革、不平等的肇因以及公司在社会中的角色等巴西社会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时，绝大多数受访者给出了与企业界的调调一致的华丽论述。简言之，此论述宣布市场为一切美德的领域并把国家描绘为对所有社会问题负有责任的罪魁祸首。这使得公民成为国家无助的受害者，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他们别无它法，只能求助于市场之神。

> 威权心态

正如 Wright Mills 所说，这种「保守精神」与当前极右势力在全球范围的强势回归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举例来说，这种威权心态——正如我们在研究的不同方面所指出的那样，这同时是一种种族主义——与高阶管理和商人中普遍存在的「企业习癖」之间的结合，是 2018 年巴西 Jair Bolsonaro 当选的根本原因。他的当选与对 Bolsonaro 主义的支持更多地是依赖大部分巴西商界激烈的活动主义和充足的财政支持。同时是著名的 Bolsonaro 竞选活动家的哈万总统 Luciano Hang——经常标志性地身着绿色西装，打着黄色领带并与 Bolsonaro 一同出现——业已成为巴西商界近年来的完美写照。

并非巧合的是，2018 年，当我们执行了大部分调查问卷之时，最受高管们崇拜的公众人物法官 Sérgio Moro，即操办洗车行动以及负责逮捕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的英雄，没有他 Bolsonaro 就不可能当选。亦非巧合的是，Moro 成为了 Bolsonaro 的司法部长以及巴西极右派最重要的象征性人物。这主要是因为巴西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刑罚想像，这在社会动盪的情况下得到强化，且通常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

此外，巴西和拉丁美洲商界的领军人物，如 Marcelo Odebrecht，一直被尊崇为伟大的领导者和正直的人：专业人士和一般人所追随的真正榜样。时任 Odebrecht 家族帝国的总裁的 Marcelo 在被指控参与了近年来拉丁美洲最大的贪污丑闻之一以后被逮捕，引起了公司员工的惊讶和错愕，最后摧毁了他那美好家庭男人的形象。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其中一个重大案例。

像 Jorge Paulo Lehmann 这样的人物，好几次被《Forbes Brasil》肯定为巴西最富有的男人，经常在我们的幻想中作为成功与诚实的值得效法的化身那样来讚美。最近涉及 Lojas Americanas 亏损的丑闻，作为当今最大的资本主义骗局之一的主角及首脑，Lehmann 和其两位合夥人 Marcel Telles 与 Beto Sicupira，也使这种成功的形象成为可疑的。在我们于其它地方发表过的研究中，其中有部分的工作是针对一些巴西商界名人的批评性传记进行调查。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人物之外，我们还分析了巴西两位明星企业家 Eike Batista 和 Abílio Diniz 的轨迹。作为一个共同发现，我们留意到在无数宣传市场的杂志封面上所描绘的关于他们著名的成功轨迹的背后，都有着极度特权的阶级起源，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成功」。

> 特权轨迹与菁英政治的虚构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可以说，巴西高阶主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现实，其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菁英主义虚构」(meritocratic fiction) 否认不平等的真实原因的世界。一般来说，与「新资本主义」所支持的接纳、宽容和可持续的言论相反，我们实际上发现的是一种环境掠夺、不接纳也不宽容的资本主义。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针对黑人的一些表面上的包容计划，以及在 Mariana 和 Brumadinho 等地发生的环境犯罪，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一些高阶主管有许多要对巴西社会交代的。■

來信寄至：

Fabrício Maciel

<macielfabricio@gmail.com>

> 鑑识技术的殖民主义

Mark Munsterhjelm, University of Windsor, 加拿大

Troy Duster、Duana Fullwiley 和 Amade M'charek 等批判理论学者们证实，种族主义之观点已渗透到鑑识技术的遗传学研究、开发和实施中。我的新书《Forensic Colonialism: Genetics and the Capture of Indigenous Peoples》(McGill-Queens 2023)先在美国，接着在欧盟和中国，说明了深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们如何透过各种方式以原住民作为祖先推断和当成表现型(外貌)来最为新技术的资源 and 目标，特别以新疆维吾尔族人最深受其害。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大学、安全机构和私营公司等等号称为科学集合体(网路)，他们共享同一叙事——以为了民众或全人类福祉的名义为由，更有效地去追捕罪犯和恐怖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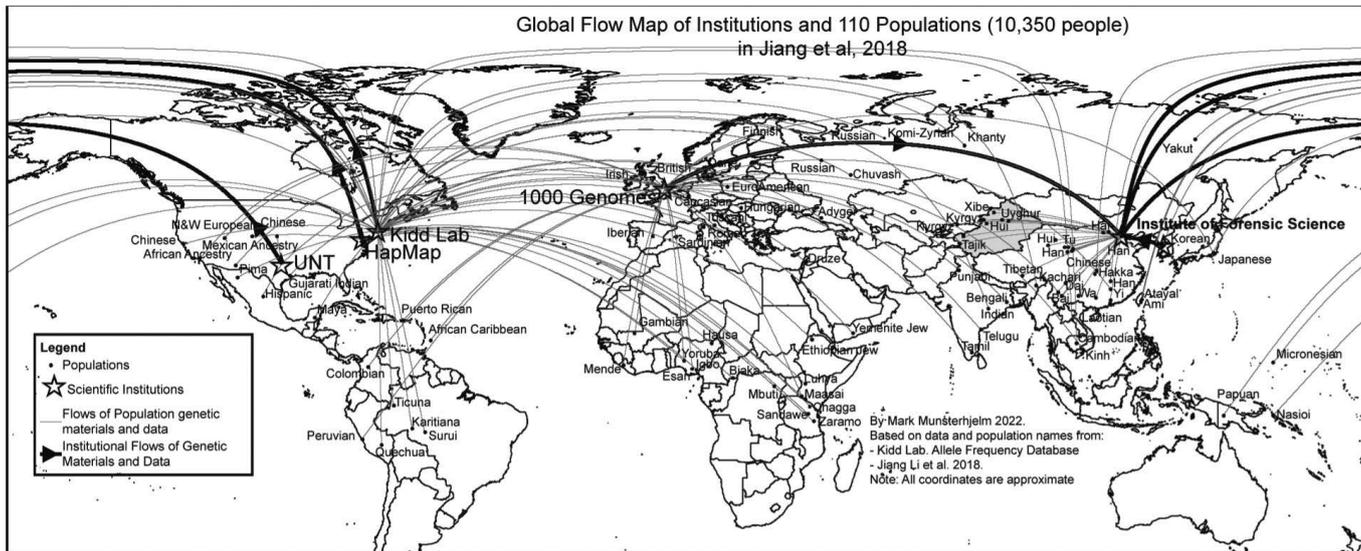
其中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例，涉及耶鲁大学的 Kenneth Kidd，他在过往的 30 多年来如何将巴西西部的 Karitiana 和 Surui 以及其他原住民族群作为他反复表明的「资源」。在巴西殖民者殖民期间，这些原住民族群几乎遭到种族灭绝，为了回应如此的情况，他们采取近亲通婚的方式试图恢复自己的族群人口数，并在基因上相互关联。在如此具争议的背景下，他们在 1987 年科学家仍对他们进行采样。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DNA 大战」期间，Richard Lewontin 和 Kenneth Kidd 等着名遗传学研究人员，他们以美国和加拿大法院引入鑑识技术遗传测试作为证据，展开了激烈的公开辩论。1990 年俄亥俄州的一起地狱天使(帮会)的谋杀案中，辩护律师获得了 Kenneth Kidd 对 Karitiana 和 Surui 族群的基因资料；他们和其他辩护律师(包括一名加拿大连环杀手的辩护律师)随后试图利用这些资料，对被告与检方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基因匹配率做出质疑。知名科学家在法庭上之证词，以及其他会议、科学期刊论文与美国大众媒体上，众人争论着有关 Karitiana 和 Surui 原住民族群基因数据的意义，以及这是否表示在北美种族界定的人群中，遗传标记的频率可能存在差异。

> 911 事件后的转变

自 911 事件以来，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对于国防安全支出迅速增长，且连动推展了鑑识技术遗传学的发展，包括祖先来源推断，与推测基因表现型(外貌)。袭击发生前，许多专家对祖先和其表现型的研究认为其在种族议题上存在争议，因为始终难以推动与持续发展此研究。然而 2003 至 2004 年，美国司法部(DOJ)以 911 事件受害者身分鑑定工作为由，开始广泛资助「替代遗传标记」(alternative genetic markers)对于祖先和其表现型的研究。Kidd 的实验室获得了 850 万美元，用于开发祖先推断和个体识别 SNP(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检测。Kidd 和他的同事于 2011 年在一份司法部资助报告中指出，他们将 Karitiana 和 Surui、Mbuti 和 Nasioi 等其他原住民族作为基因差异例子以提高技术稳定和普遍性：「我们研究特别纳入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几个孤立和近亲繁殖的少数族群」。

2015 年，美国制造的商业法医基因分析系统中，已包含了这些标记检测。这些商业系统对于原住民进行测试，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Yavapai 原住民所进行测试的 Illumina FGx，其采样时间早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另外，中国保安机构在维吾尔族人身上测试了 Thermo Fisher Ion Torrent 系统，其部分结果在 2016 和 2017 年中国政府对新疆镇压期间的 Thermo Fisher 会议上，进行了结果的展示。

911 事件后，中国政府以全球反恐攻，取代原先「反革命」的说词。这样的叙事方式，将中国塑造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且他们仍持续强化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升级对其殖民的力度。2010 年代初期，中国公安部的司法鑑定科学研究所，与 Kenneth Kidd 合作开发祖先推断的 SNP 标记测试，用以区分汉族、藏族和维吾尔族。这项合作使 Kidd 得以在 2015 年在中国受试者身上测试他的 55 个祖先标记测验。而作为回



基德实验室贡献了来自46 个人口群的 2266 份 DNA 样本,这使得鑑识研究院科学家取得了更具全球代表性的资料,并能够更好地测试 Jiang Li 等人(2018)于文章中呈现的 27 个祖先推断标记面板。来源: Munsterhjelm, 2022。

报,他提供了从Kidd实验室的细胞系中提取的DNA 样本,共有2266个样本,涵盖了46个族群(包括 Karitiana 和 Surui)。鑑识技术机构利用这些样本开发他们自己祖先的推断SNP标记,如: [Jiang 等人](#)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使用了代表110个群体的10350个样本,其中使用957个维吾尔族人的样本(严重超样)。自2010年代初以来,鑑识技术机构已获得8项有关祖先推断标记的中国专利(和3项申请),其中不断直接针对维吾尔族与藏族取样(如CN103146820B和CN107419017B)。

鑑识技术机构、北京基因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上海计算生物学机构)共同进行研究,他们对针对维吾尔族人的表现型技术进行开发,并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间发表的系列研究中,涉及数百名维吾尔族受试者。以上这些研究,都在在显示,也反映了对维吾尔族人安全关注的持续增长。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计算生物学机构的科学家,他们又与Visible Genetic Traits Consortium 合作,其涉及大量欧洲(如 TwinsUK)、澳洲和拉丁美洲受试者。[Liu 等人](#)在 201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收录了近 29,000 名受试者,而其中包括约 700 名的维吾尔族人。

上述合作研究,有部分已终止。因为自 2017 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犯下的反人权罪行的谴责声浪日益增多,包括在再教育营中,他们对维吾尔族人的大规模监禁,与对其在宗教、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压制,更别提及大规模地对他们在生物识别和基因定性上的剥削。当基因研究成为人权观察报告和西方媒体国际报告的主题时,这种逐渐增长的谴责声音终于中断了基因研究。2019 年,Thermo Fisher 宣布停止在新疆销售人体辨识产品。2020年,随着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美国商务部对法医学机构实施制裁,然而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削弱了全球反恐的合作。此外,一些参与其中的西方和中国科学家,他们也不再参与进一步的研究,并否认此研究有任何不法之行为。

这些具影响力的鑑识技术基因合作参与了大规模侵权行为,包括对几十年前采集的样本在未经授权之状况下就对其二次使用,这已违反了当代道德规范,及原住民之主权和权利(《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中第 31 条)。在与中国国家安全机构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新疆民族的科学合作中,反映了对弱势族群研究限制的错误。总之,鑑识技术遗传学中普遍存在的种族配置概念和等级制度,需要被进一步的调查与公开辩论。■

來信寄至:
Mark Munsterhjelm
<markmun@uwindsor.ca>

> 联合国机构内(外)的多样性与透明度

Vitória Gonzalez, Plataforma CIPÓ,《全球对话》助理编辑,巴西



加拿大活动家/艺术家 Benjamin von Wong 创作、题为「关闭塑胶水龙头」的纪念碑，矗立于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会场之外。来源：UNEP/Cyril Villemain。

多元性需要在各种领导职位中得到体现——无论是在公共领域，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还是在私人领域。在决策空间中有不同经验、观点和生活故事的代表性人士将带来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的讨论和政策。换句话说，来自少数群体的代表性人士至关重要，是民主的关键因素。他们的代表性确保了被忽视和社会歧视的大多数群体能够进入决策空间，使其想法和利益得到关注。

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和民主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因为政治权力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赋予社会合法性，而且还有实质层面，因为它使人能够进入权力和资源，从而以具体方式影响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担任高阶职位的可能性以及有效访问资源必须由拥有不同社会标记的人共享，这直接涉及社会正义的概念。

当国际政策制定主要由来自全球北方的白人男性的决策引导时，它不仅倾向于排除少数群体的利益、经验和观点，还倾向于将前者的经验和观点普遍化。因此，强调在联合国等组织的领导职位中具有更大的多样性，除了是一个在

象征上充满意义的民主和正义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它可以透过提供创新的基层观点，改善当代全球辩论和挑战的政策结果。

如果考虑到与环境和发展相关的议程，这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但尤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改善代表性至关重要。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不成比例影响以及与贫困和不平等相关的挑战，这些挑战在其国内和与全球北方的比较中都存在。脆弱性、有限资源和对气候敏感行业的依赖是这里需要考虑的一些主题。

> 联合国体系内代表性不足

考虑到联合国体系，各种群体在高阶领导职位上都存在代表不足的情形，如果我们从交集的角度来看，这些代表不足的层次会有所重叠。特别是，女性和来自全球南方的个人的代表不足突显得相当严重。这是一个需要由组织内不同机构认真迅速地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查找有关候选人选择、任命和任务细节的官方资料和资讯并不容易。这种困难妨碍了公众的审查——透明度对于民主也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

基于这种资讯量不足的问题，最近由变革与包容的女性领袖之声进行的研究对性别问题非常宝贵。该研究显示，自1945年以来，在世界上最重要的33个多边组织中，共有47名女性和335名男性担任领导职位。在分析的机构中，有五个机构曾由女性领导过一次，而有13个机构从未由女性领导过，包括联合国秘书处。除了定量分析之外，从质量上思考也很重要；例如，女性不应仅仅被任命到与性别问题相关的职位，或者历史上与性别问题有关的主题，比如儿童和照顾。

关于国籍，PassBlue发表的一篇文章举例说明了联合国五个关键机构（政治与和平建设事务部、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道事务协调厅、反恐办公室和和平行动部）的高级领导职位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担任。这创造并加深了垄断，加剧了不同的权力失衡。

最近由Blue Smoke发表的政策简报《揭示不平等：聚焦联合国环境和发展机构的高级任命》¹，突显了联合国四个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食物和农业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高级领导任命中透明度和多样性的缺乏。这四个机构对环境和发展问题至关重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气候紧急情况时。由于全球南方人口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比例不成比例地高，尤其是对女性和女孩，因此在这些机构内考虑地区和性别代表的程度至关重要。该简报还强调了在这四个机构中，只有20%的高级领导人是女性，平均有40%来自全球南方。

自1966年以来，UNDP已有九位行政主任。其中，仅有一位是女性，而且只有一位来自全球南方。自1972年以来，UNEP已有八位执行主任：其中三位是女性，两位来自全球南方。转而说到FAO，自1945年以来已有九位总干事；虽然其中五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但没有一位是女性。最后，CBD自1993年以来已有七位执行秘书；其中六位来自全球南方，三位是女性。因此，这种不平衡是持续存在的，显示了不同的权力机制。

> 代表性：应对当今时代挑战的关键

因此，在代表性和代表性方面的权力失衡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关切。这是一个可以从这四个研究案例中延伸出来的问题，并包括除了性别和地理来源之外的社会标记，如种族和宗教。因此，这

是一个需要更加显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合国内部高级领导职位的选拔过程（以及整个职员阶层）需要更加透明、公平和民主；这些职位的任命应更多地基于候选人的生活经验和技能能力，而不是个人关系或政治交易。特别是关于气候紧急情况，保证更多的代表性对应对与环境和发展相关的挑战至关重要。

为了制定能够考虑到当地特殊情况并解决最脆弱地区人民需求的全球机制，让这些人口参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透过在领导层中接纳多样性，我们有助于民主化这些决策过程，提升气候行动的整体效能。当地的生态知识和技术是这样的努力可以实施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开展项目以产生公民数据，允许具有不同背景和世界观的人们参与并影响研究和政策设计。

专注于透明和民主的任命程序，并努力实现更平等的领导职位代表性，考虑到性别、地理来源、种族和族裔，以及其他社会标志，这是当务之急。这涉及民主化全球公共议程，为这些职位提供更大的合法性、可信度和社会信任，并加强联合国内部和超越联合国的机构的能力。正如我们所主张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民主和象征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正义和技术改进的问题。对于联合国来说，作为一个旨在建立和平、保护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参与国际合作的组织，考虑到我们正在面临影响全球的气候紧急情况，这些挑战迫在眉睫，需要超越言语的修辞面对。

必须强调的是，多年来一直在议程上的迫切挑战仍然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并非所有解决方案都来自国际组织或政府，但它们是我们世界的构成部分。它们将继续失败代表「我们，人民」还有多久呢？■

1. 我要感谢Júlia Hara Medeiros和Nayifa Nihad进行了这项研究，我有幸参与审查，同时也要感谢Blue Smoke—特别是Plataforma CIPÓ 提供见解，启发我写下这些文字。

来信寄至：

Vitória Gonzalez

<vitoria@plataformacipo.org>

Twitter: [@vit_gonzalez](https://twitter.com/vit_gonzalez)

